

2003年11月號

批判與再造

1

批判・進步・解放



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論

為什麼要社會主義？



帝國主義不只是一種風格



透析金權政治

——資本主義國家機器與資產階級

揭開韓國的金權政治史



教改亂改，見怪不怪



「我要向RCA討公道！」

——訪RCA自救會會長梁克萍女士



召喚苦難民眾的靈魂（上）

——鍾喬的魔幻帳篷劇

蒙面叢林（一）

——探訪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



霜降（一）

——顏世鴻的回憶錄

紀念黃賢忠烈士



三農問題會不會導致 中國崩潰？

發刊詞

特載

- 01 為什麼要社會主義？
文 ■ 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譯 ■ 鄭國棟

帝國主義批判

- 05 帝國主義不只是一種風格
■ 陳信行

金權政治批判

- 08 透析金權政治
——資本主義國家機器與資產階級
■ 林宗理

- 18 揭開韓國的金權政治史
■ 臧汝興

台灣焦點

- 21 教改亂改，見怪不怪
■ 張戢

社會現場

- 29 「我要向RCA討公道！」
——訪RCA自救會會長梁克萍女士
——RCA職工系列專訪之一
訪問 ■ 杜繼平 / 整理 ■ 林育群

文化廣場

- 37 召喚苦難民眾的靈魂 (上)
——鍾喬的魔幻帳篷劇
■ 林子竝
- 43 蒙面叢林 (一)
——探訪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
■ 吳音寧

歷史檔案

- 52 霜降 (一)
——顏世鴻的回憶錄
整理 ■ 藍博洲

- 57 紀念黃賢忠烈士
■ 劉孝春

大陸形勢

- 59 三農問題會不會導致中國崩潰？
■ 李昌平

發行人 范振國
社長 黃德北
總編輯 杜繼平
執行編輯 陳乃慈

發行所 批判與再造雜誌社
社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4巷12號
編輯部 台北縣新店市德正街27巷29弄60號3樓
電話 (02) 8914-7520
傳真 (02) 8914-7520
電子信箱 critra99@yahoo.com.tw

零售 90元
訂閱 一般訂戶 / 一年1,000元
團體訂戶 / 5,000元

» 歡迎捐款贊助

郵政劃撥帳號：19803670
帳戶：批判與再造雜誌社
北市建國商號02字第205-400號

發刊詞

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英、美的統治階級發動了自由市場至上論的保守主義革命，放鬆國家對市場的管制，解除對資本的限制，資本便如脫疆之馬在本國內外奔騰起來。同時，原社會主義國家也陸續遭到和平演變，紛紛棄甲曳兵，自動繳械，對資本主義不戰而降。二十多年來，在信息與通訊科技的助威下，資本如虎添翼，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與規模，肆無忌憚地縱橫馳騁於世界市場。資產階級得意洋洋，春風滿面，右派歡欣鼓舞，齊聲歡呼資本主義大獲全勝，意氣囂張地宣告歷史已經終結，為資本高唱凱歌，替社會主義譜寫安魂曲。所謂「全球化」被迴環讚頌為舉世福音。

經濟全球化在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論指導下，把市場供奉為神，凡事都被送上市場的法庭裁決功過是非。競爭是動力，效率是最高道德，利潤則是最大的目標。人與人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乃至國與國之間，都在強調競爭力，都在追求最大的利益。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弱肉強食的叢林哲學瀰漫於整個世界，於是乎就如十八世紀的英國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說的，「人對人像狼一樣」。「全球村」(global village)，實則已淪為殘酷的「全球掠奪」(global pillage)。

自由市場經濟論掛帥的結果就是人與自然環境都成了市場的俘虜，都只是創造利潤的工具、材料，國家也該俯首甘為市場牛，向市場稱臣拜服，為市場機制服務，按全球競爭的邏輯辦事。於是我們看到，在經濟自由化、全球化下，各國紛紛解除對市場的管理措施，資本掙脫了束縛後，如雄鷹、如狂馬、如猛獅、如惡虎般，縱橫四海，在全球市場上相互拼搏、撕殺。為了克敵制勝，不惜裁員減薪砍削員工福利來降低成本，以輕裝上陣，凌厲出擊；復四處尋覓價廉物美的勞動力與稅輕利重的豐腴之地，以飽饜膏脂，充實壯大。歐美戰後實行三十多年的社會福利體制在資本步步進逼，政府撒手下，遂節節敗退，政府社會福利支出銳減、勞工失業率急遽上升，社會不平等加劇，社會日趨分化，國家內部的裂痕日深，治安惡化，深懷挫折、不滿的民眾排外情緒日增，等等問題叢生，從而侵蝕了民主的基礎，市場與民主出現了愈來愈深刻的矛盾。經濟尚不發達的開發中國家境況更糟，為了招商引資，以補本國資金、技術不足，競相提供低廉的勞動力、土地，鋪設基礎設施，減免租稅，期求國際資本的眷顧，這就必然要壓制勞工、降低環保標準，以犧牲人與自然為代價。

在資本的鐵蹄踐踏下，全世界的失業人口有增無已，不論是一國之內或各國之間的貧富差距都在急遽惡化，社會不安與日俱增。當權的政客與資本家大玩金錢與權力交易的把戲，驕奢淫逸，而全世界愈來愈多的勞動人民卻飽受資本的淫威，備嘗痛苦與煎熬，輾轉呻吟，哀哀無告。如今，美、歐、日各帝國內資產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正加深和激化，

美、歐、日各帝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矛盾也在加深和激化，在發展落後國家內，統治階級和廣大人民之間的矛盾同樣在加深和激化。也可以說世界上廣大人民與以美、歐、日各帝國為基地的國際資本之間的矛盾在加深和激化。

在社會主義勢力潰不成軍之際，美國帝國主義睥睨四海，更啟獨霸宇內的狼子野心，妄圖一手主導世界的政治、經濟秩序，既全力推動資本全球化的進程，亦四處出擊，以大軍壓迫有礙於霸業者。全球杌隉不安，國際風雲日亟。可以預見，在資本主義大行其道，各國競相激烈爭奪資源與市場的二十一世紀，世界將無寧日，勞動人民的處境也必日趨險惡。

今天，中國兩岸的政治經濟結構容有差異，但同處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內，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制於資本主義的經濟運動規律，都無法倖免於資本全球化的嚴峻挑戰。再者，兩岸的分裂與對峙，是美國帝國主義強行介入中國內戰的結果。台灣的分離勢力多年來依附於美日帝國主義，充當其在台代理人。近來公開明言「釣魚台是日本的」、「美國是台灣的恩人，台灣人不可忘恩負義」等語。在最近的美伊戰爭中，更以舉世僅見的露骨言詞，恬不知恥地甘為美國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幫凶，這不獨使台海地區成為爆發戰爭的高風險地區，更令兩岸人民滋生不必要的不信任乃至敵對心理，極其不利於兩岸人民的團結。所可憾者，有部分深具良知與正義感之士，在反國民黨專制政權的鬥爭過程中，未能認清台灣分離勢力的本質，竟遭挾以俱去，誤擲其心力，助長了台灣分離勢力的反動氣焰，實堪浩歎，而有匡正之必要。

面對上述逼人而來的危局，身為台灣的左翼，我們當然不能坐視不顧，默爾而息。

對二十世紀末葉社會主義實踐的挫敗，有人灰心喪氣，變節轉向，有人徬徨困惑，不知所向。但我們並不悲觀失志，陷於消極頹唐，我們深諳「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的歷史辯證法，只要資本主義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日益深化，社會主義的力量就必然煥發其強勁的生命力。不過，我們也不是盲目樂觀的歷史循環論者，深知必須實事求是，認真總結一百多年來社會主義運動在理論與實踐上的成就與失誤，理性而務實地面對當前與往後將至的現實難題，以期通過批判、探索，再造社會主義的盛況。

德國詩人海涅說得好：「思想走在行動之前，就像閃電走在雷鳴之前一樣。」在舉世為資本的黑雲籠罩，人心惶怖不安之際，要讓左翼的春雷轟鳴，繼之以甘霖普降，就必須先有思想的閃電刺破黑暗，照明方向。因此，我們決定創辦《批判與再造》，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結構及其意識型態展開全面的批判，並關注台灣與大陸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問題，期能為探索社會主義的出路，盡尺寸之功，為集結左翼力量鋪墊堅實的基礎。

萬事起頭難，要在台灣這片左翼理論與實踐的根基薄弱的貧瘠之地播種深耕，更是難上加難。但我們不畏艱困，期望能披荊斬棘，與全世界的進步力量匯合，衝決資本鋪天蓋地而來的重重網羅，以獲得人的全面解放。◎

為什麼要 社會主義？

文■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 譯■鄭國棟

愛因斯坦創立「相對論」，推倒了主導西方科學二百餘年的牛頓古典力學，人類的宇宙觀為之丕變，物理學自此開啟了新的紀元，舉世無不推崇他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但較不為人知的是愛因斯坦自青少年時期始，終其一生都是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他除了孜孜於科學研究，對人類的命運也無時或忘。尤其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深為憂懼在科學昌明下，戰爭恐有毀滅人類文明之虞。1932年7月30日他致函著名的心理學家佛洛伊德商討消弭戰爭之道。信中痛責各國壟斷政治、經濟權力的一小撮統治階級利慾薰心，為了一己的私利與權位而不惜發動戰爭，以萬民為芻狗。二戰期間，他旅居美國，卻因他思想左傾並參與了左派的反戰和平集會，美國聯邦調查局自1940年始，便嚴密監視他的言行。到他逝世，FBI監視他的檔案材料累計達數千頁之多。1947年，當愛因斯坦知悉他遭到FBI監控後，深表失望地說：「我之所以選擇美國，是因為我聽說這個國家有充分的自由。我選擇美國作為自由的國度，實際上犯了一個錯誤。這個錯誤，我終生無法彌補。」

本文是愛因斯坦在1949年為美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刊物《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的創刊而作。文中詳述了他主張社會主義的理由，後收入1950年出版的晚年文集：《Out of My Later Years》。1992年五月與1994年五月，《每月評論》又兩度重刊本文。在半個多世紀後，衡諸當世，再讀斯文，仍有足多發人深省之處，爰加逕譯，以饗讀者。■□編者

以一個並非經濟與社會問題專家的人來表達對社會主義的看法，恰當嗎？我有許多的理由認為這並無不當。

我們先從科學知識的觀點來思考這個問題。天文學與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看來似乎沒有根本的差別：這兩個領域的科學家都試圖從特定類別的現象中發現普遍認可的規律，使這些現象的相互聯繫盡可能明白易解。但實際上，兩者的研究方法確實存在差異。被觀察的經濟現象經常受到許多很難分開評估的因素的影響，這就給發現經濟學的普遍規律造成困難。此外，眾所週知，自所謂文明時期開始，對人類的歷史經驗有重大影響與限制的，絕不僅僅只是經濟因素這一項。例如，歷史中的大國多半都由武力征伐而來。征服的民族在被征服的國家中，從法律上與經濟上都自居為特權階級。他們壟斷了土地所有權，從本民族中任命教士。這些教士掌控了教育，使社會的階級劃分歷久不變，並創造一套道德規範，使人民的社會行為不太自覺地循規蹈矩。

科學無法設定目標

最多能提供達成目標的手段

但歷史傳統是關乎所謂昨日之事；至今我們仍未克服凡勃倫【譯按：Thorstein Veblen (1857~1929)，美國制度經濟學派創始人，著有《有閑階級論》等名著】所說的人類發展的「掠奪時期」。我們可觀察到的經濟事實屬於那個時期，而且就算我們能從那個時期的經濟事實得出一些規律，也無法應用到其他時期。由於社會主義的真正目的正是要克服並超越人類發展的掠奪時期，當前狀態的經濟科學對闡明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實在沒什麼幫助。

再者，社會主義是由一個社會——道德的目標所指引的。然而，科學無法設定目標，更無法把目標浸潤於人類心中。科學最多能提供達成某種目標的手段。但目標本身得由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的人設想出來，如果這些目標沒有夭折，而

是生機勃勃，充滿活力，被許多人奉行不輟，這些人在半知半覺中就會推動社會緩緩演進。

基於這些理由，我們必須警惕，在對待人的問題時，不要過於高估科學與科學方法；我們切莫以為，對於影響社會組織的問題，只有專家有權表達他們的看法。

近些時日來，斷言人類社會正遭逢一場危機而岌岌不保的說法甚囂塵上。這種情況特有的表現就是個人對所屬的群體，不論大小都漠不關心，甚至懷有敵意。這裡且記述一段個人經驗，以闡明所言之意。最近我和一位與人為善的才智之士論及恐怕有再爆發一場大戰之虞，就我看來，果然成真則人類得倖存者幾希，我提到只有建立一個超越國家的組織可保人類免遭此大禍。一聞此言，我的訪客隨即冷冷地對我說：「你為什麼這樣極力反對人類滅絕呢？」

我確信，僅在一個世紀前，不會有人這麼若無其事地說出這種話。這種話出自力圖達到內在平衡卻不可得，終乃或多或少灰心喪志的人。這表示這些日子裡許許多多的人正飽受孤獨與寂寥的痛苦煎熬。何以致此？可有出路？

提出這樣的問題容易，但要回答卻難有把握。我深知我們的情感與企求常是矛盾、含混不清的，無法言簡意賅地表述。

個人的生存依附於社會

人同時既是獨個的存在物，又是社會的存在物。作為獨個的存在物，他力圖保護自己和最親近的人的生存，設法滿足個人的慾望，發展天生的能力。作為社會的存在物，他力求獲得同胞的認可和喜愛，共享他們的歡樂，撫慰他們的哀愁，增進他們的福祉。只有人心中這各不相同而又往往衝突的企求才能說明人的特性，保己與愛群、私利與公義之心的結合方式決定了個人的內在平衡能達到何種程度，對社會的福祉又能有多大貢獻。這兩種驅動力的強弱對比極可能大體上是與生俱來的。但最終呈現的人格卻大部分是由

他身心發展時所遭逢的環境、成長於其間的社會結構、那個社會的傳統及其臧否行為的標準所塑造。「社會」這個抽象概念對個人來說，意味他與同代人及前世代所有人的直接、間接關係的總合。個人能夠自己思考、感覺、努力與工作，但他的身體、知識與情感無不深深依附於社會，因此要在社會框架之外，思考一個人或了解他，根本不可能。正是「社會」提供人食、衣、住家、勞動工具、語言、思考的形式與大部分的內容，是古今隱身於「社會」這個小字眼後的千百萬人的勞動與成就才使他得以存活。

因此，很明顯，個人依賴於社會是個無法泯除的自然之事——就像螞蟻和蜜蜂一樣。然而，螞蟻與蜜蜂的整個生命歷程鉅細靡遺都完全由遺傳的本能所確定，人類的社會型態與相互關係卻是多種多樣且易於變遷的。記憶，重組的能力，口頭交流的天賦使人能不受生物的必然性的支配而有所發展。這樣的發展顯現在傳統、制度與組織，在文學，在科學與工程的成就，在藝術作品上。這說明了人怎麼能通過自己的行為影響他的生活，也說明了有意識的思考與要求怎麼能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作用。

人從出生就經由遺傳具有固定不變的生物結構，其中包括人類特有的自然衝動。此外，在他的一生中，他還通過交往與其他類型的影響，從社會中獲得一種文化結構。正是這個文化結構會隨著時光推移而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現代人類學通過調查研究，比較了所謂的原始文化，教導我們說，人類的社會行為依據盛行的文化形態與在社會中佔主導地位的組織類型，可以有極大的不同。那些為改善人的命運而奮鬥的人正是把希望建立在上述的基礎上：人類並不會因生物結構使然就註定要互相毀滅或無法擺脫自殘的殘酷命運。

罪惡之源在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無政府狀態

如果我們自問，為了使人的生活盡可能的滿

足，社會結構與人的文化觀點該怎麼改變，我們必須時時意識到有些情況我們是無法更動的。如前所言，人的生物本性實際上是不會變化的。再者，過去幾個世紀的技術與人口發展已經造就了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以人口之相對密集與維持人類生存所必需的產品而論，細密的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產機構是絕對必要的。那個回顧起來閑適宜人、個人或較小的群體可以完全自給自足的時代，已經一去永不復返了。若說人類目前已構成了一個生產與消費的全球共同體，並非太過甚其辭。

現在我可以簡單陳述，就我看來，造成我們時代的危機的根本原因何在。這涉及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個人已比以前更察覺到他依賴於社會。但他覺得他對社會的依賴並不是一項有益的資產，他與社會不是脣齒相依的關係，社會也不保護他的生存，這種依賴關係反而威脅他的自然權利，甚至危及他的生計。更有甚者，他本性中自私自利的慾望因所處的社會位置而越來越強烈，而本來就比較微弱的社會公益之心則越來越消沉。所有的人，不論他們身居何種社會地位，都遭到社會公益之心日趨消沉的禍害。他們毫不自覺地陷於私欲橫流中無法自拔，惶惶不安，孤獨寂寞，享受不到純真、簡單、質樸的生活樂趣。人生短促又多險，只有獻身於社會，方可尋得生命的意義。

依我之見，真正的罪惡之源就在於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無政府狀態。我們看到一群龐大的生產者，相互之間不停地力圖剝奪他們集體勞動的成果——不是憑藉暴力，而是一起格遵法律制定的規則。就此而論，認識到這點很重要，就是生產資料（即生產消費品及追加的資本品所需要的生產能力）在法律上可能是（大部分而言其實也是）個人的私有財產。

為了簡單起見，以下的討論我會稱凡不擁有生產資料的人為「工人」，雖然這樣並不完全符合這個詞的一般用法。擁有生產資料的人有能力

購買工人的勞動力。工人使用生產資料生產出新商品，歸為資本家的財產。這個過程的緊要之處是，工人生產出的商品與付給他的工資之間的關係，兩者都依據真正的價值來衡量。只要勞動契約是勞雇雙方「自由」訂立的，工人所得到的報酬就不是由他生產的商品的實際價值來決定，而是既取決於工人維生的最低需要，也取決於資本家對勞動力的需求與競求工作的工人數量之間的關係。即使在理論上說，工人的報酬也不由他的產品的價值來決定，瞭解這一點很重要。

私人資本支配下的民主有名無實

私人資本傾向於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部分由於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部分由於技術發展與分工日趨細密促使較小的生產單位消失，形成較大規模的廠商。結果是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其權力之大連民主社會也制衡不了。這絕非虛言，立法機構的成員是由政黨挑選出來，政黨的經費則大部分由私人資本家資助，要不然就深受資本家的影響，資本家實際上從中隔開了選民與國會議員。結果，人民的代表事實上並不能充分保護勞苦無告的下層人民的利益。更有甚者，在現存條件下，私人資本家必然直接或間接控制報紙、廣播、教育等資訊的主要來源。這樣一來，個別的公民就極難做出客觀結論並明智地運用他的政治權利，實際上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非常不可能的。

在私人資本為基礎的經濟常以兩大準則為特徵：第一，生產資料（資本）是私有的，依資本家的意志支配；第二，勞動契約依勞資雙方的自由意願訂立。當然，就此而論，沒有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特別直得一提的是，工人經過長期而艱苦的政治鬥爭，已經獲得了成果，使某些行業的工人的「自由勞動契約」有了些許的改善。但總體而言，目前的經濟型態與「純粹」的資本主義並無多大的差異。

生產是為利潤而開工，而不是為生產有用的產品來滿足人的需求。沒有條款規定所有有能力

且有意願工作的人都能就業，一支「失業大軍」幾乎總是存在。勞工老是惴惴不安地害怕失業。由於失業與低薪的工人沒有足夠的購買能力提供有利可圖的市場，消費品的生產也就受到限制，結果就滋生深重的貧困。利潤的動機及與之俱生的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造成資本的積累與運用波動不定，導致越來越嚴重的經濟衰退。沒有限制的競爭令工人失業，浪費了大量勞動力棄置不用，也造成我前已提及的對個人的社會意識的斬傷。

社會主義是唯一的出路

我認為資本主義的罪大惡極之處就在於對個人的這種戕害。我們整個的教育制度都深受這種罪惡之害，學生都被灌進了過份強調競爭的想法，訓練他們崇拜名位利祿以為未來生涯之資。

我深信要清除這些深重的罪惡只有一條路，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同時建立一套導向社會目標的教育體系。在這樣的經濟制度中，生產資料歸社會本身所有，並制定計畫來使用社會化的生產資料。調整生產以適應社會需要的計劃經濟會把工作分配給所有有能力勞動的人，也會確保每個男人、女人、小孩的生計，對個人的教育，除增進他天生的能力外，還要培養他對同胞的責任感，使他不再陷於我們當前社會崇尚權力與功成名就的習氣。

然而，必須記住計畫經濟並不就是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也可能同時發生個人完全的奴化。要實現社會主義必須解決一些極為困難的社會、政治問題：鑑於政治與經濟權力集中的範圍極為廣泛，怎樣才能避免官僚體系專權跋扈？怎樣才可以保障個人的權利從而確保反制官僚權力的民主力量？

在我們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釐清社會主義的目標與問題具有最重要的意義。由於在當前的環境下，自由而沒有阻礙地討論這些問題被懸為厲禁，我認為這本雜誌的創刊對公眾是個重要的貢獻。◎

帝國主義

■陳信行

不只是一種風格

還記得「後現代」時代嗎？僅僅幾年前，在冷戰甫結束的迷亂氛圍之中，全球各地的知識文化圈紛紛宣布百餘年來的政治話語過時了：社會主義對抗資本主義、民主對抗強權、民族解放對抗帝國主義，這些曾經喚起無盡熱情的論述，據說都已過時了，因為國界已消融、革命已老死、民主已成老調，而資本主義無遠弗屆的全面勝利使我們不再能夠適切地對其分析批判，只能或驚嘆或憂悶地臣服。

如果要說911事件後美國布希政權的屠戮征伐有什麼正面效果，恐怕就是讓全球人民重新認識那些據說已經過時的政治論述，恐怕只是未完成的任務。

帝國主義論沒有過時，依然合乎時宜

世紀之交以來，美國發生的一連串戲劇性的發展，讓即使最溫吞的自由派都看不下去。首先，號稱兩百年基業的民主選舉制度，竟然讓人靠著朋黨營私違法竄奪；僭主小布希上台之後，開始廢除一連串從環保到武器管制等改革性的國際條約與國內法制；過沒多久，內閣高官與正副總統本人紛紛被暴露出牽扯在各種美其名為「公司治理問題」的鉅額詐欺案中；911事件發生之後，布希政權逐步拋棄一切國際法上的正義外衣，侵略阿富汗與伊拉克；現在，這個當年以反殖民立國的國家軍事佔領統治著殖民地伊拉克，而幾個月前發動戰爭的理由，現在被發現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若非抱著或權謀、或怯懦、或犬儒的心態而甘於依附強權，或是無可救藥地天真到相信

布希政權的說詞，絕大多數人在過去這幾個月來是能夠分辨是非的。侵略戰爭是錯的，這是帝國主義！從宗教領袖到常民百姓、從布希的家鄉德州到向來親美的台北，千萬人上街遊行譴責侵略戰爭。「帝國主義」這個名詞再次恢復了家喻戶曉的地位。連美國大資本喉舌《華爾街日報》現在也習慣了使用這個幾年前還是禁忌的字眼，只不過它並不反對帝國主義。

譴責帝國主義是一回事，但是，到底這些在幾年前看來還不可思議的發展是怎麼回事？

永遠樂觀的自由主義者喜歡這麼想：帝國主義是一種品味低劣的行事風格，它粗暴地踐踏殖民地人民的人權與尊嚴，但是它的出現純屬意外，是竄位的布希政權中一小撮無恥的新保守主義挾持了美國（及其幫手英國）政府的結果，使得原本應該增進全球人民福祉的全球化進程遭到了挫敗。

這種說法有其道理。的確，當今美、英政府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以其本國的政治體制與傳統來衡量，或許現在正處在歷史新低點。但是，我們應該追問的是，換人來做就會不一樣嗎？換句話說，帝國主義只是一種風格，還是有其不得不然的政治經濟結構？反戰，只是反對帝國宰制的粗暴一面，還是反對一個更大的壓迫體制？

帝國主義不只是一種行事風格，而是資本主義在壟斷資本為主的時代中幾近必然的一種解決其危機的策略。這是霍布森、列寧、盧森堡、考斯基等人在上一次世紀之交時透過激烈的辯論提出的一個深具洞見的命題。他們認

為，資本主義的剝削機制必然導致生產過剩、需求不足、利潤率趨於下降等積累危機趨勢，而隨著金融資本的興起與壟斷化，這個趨勢不再只能由週期性的商業危機來隨機地解決，而常常由國家主導的對外擴張市場、輸出資本等手段來尋求緩和的機會。從新市場得來的超額利潤緩和了國內的階級矛盾。這種策略造成十九世紀末的帝國主義瓜分全球勢力範圍，也導致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這個說法過時了嗎？

要嚴謹地檢驗上述命題的適用與否，當然需要更深入的探討。我再只能就一些跡象來建議：這種觀點依然迫切合時。

美國的經濟體系危機四伏

經濟危機在二十世紀末與十九世紀末一樣，仍然是全球風貌的一個醒目特徵。1997年從東亞金融危機爆發開始的全球性危機根源於生產過剩，這是愈來愈難忽視的事實。剛開始的時候，這些危機只在東南亞、韓國、日本等前一個階段經歷了外銷導向投資劇烈膨脹的地區出現。後來延燒到巴西、阿根廷、俄羅斯等背負鉅額債務的國家。當時興旺的美國衍生性金融商品以及網路資訊科技投機還被認為是不錯的資本避風港。歐元的興起也曾被認為是新希望。六年過去了，危機依舊。G7國家的產能利用率從2001年的78%落到2002年的75%。在美國國內，2002年的產能利用率僅73.8%。經濟蕭條對美國人民造成的具體影響可能遠比官方統計的6.5%失業率（或11.0%，若加上低度就業、邊緣就業型態等等）所顯示的更嚴重。根據2002年12月全美市長會議（U.S. Congress of Mayors, December 2002）的報告，去年一年中，尋求緊急食物援助的市民增加了19%，調查中的每一個城市都有增加；而尋求緊急收容援助的市民同樣也增加了19%，在調查中的88%的城市有增加。美國若

非處於今日的獨霸地位，其經濟情勢很難避免導致愈來愈尖銳的國內階級矛盾。

當前的帝國主義世界經濟與二十世紀初最明顯的不同，就是美國一個國家的獨霸。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在資本主義陣營內的獨霸地位就能夠使得它長年維持高額的進出口赤字，進口遠高於出口的商品與勞務。2002年，美國的貿易赤字就高達\$4350億美元，比前一年高出\$770億美元。長期失衡的貿易支撐了美國的東亞貿易伙伴近年來的成長，到今年五月為止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國家外匯存底（主要來自長期對美貿易的盈餘）已經從1995年的5千億美元上升到13兆美元。大量廉價的消費品與各種資源流到美國市場緩解了該國國內的階級分化與階級矛盾，正如同19世紀末殖民主義經濟體系對西歐帝國主義國家所起的作用。

然而，這種失衡的狀況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在90年代，美國國際收支經常帳的赤字主要是靠著大量流入美國股票及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企業併購、房地產等等的投資來抵銷。2001年網路股市泡沫破碎後，這些流入的資金主要投資在短期債券上。根據 Business Week Online(3/18/2002)的報導，2001年美國經常帳赤字中高達97%是由外國人投資公債之外的其他美國債券來抵銷。與往年的模式不同的是，股票房地產一旦崩盤，投資者得願賭服輸，這些債券卻很快就會面臨付息的壓力。這使得目前的美國的經濟形勢更顯脆弱。而這種脆弱的狀況隨時可能會由於某種投資人的信心崩潰而受到巨大的壓力，使得這個佔當前世界經濟25%的經濟體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藥庫。

美國的侵略戰爭源於壟斷資本的體制

面對這種經濟難題，美國當權派的作法是什麼？為富人減稅、為投機事業護航、增加軍事開支……。布希政府的一系列作法幾乎毫無

例外地不尋求緩和結構性危機，而是試圖讓大企業在崩盤之前能撈多少就撈多少。整個危機四伏的美國經濟體系，以及依靠著美國市場的世界經濟體系，要保持懸而不墜，在布希政府的盤算中，只有依靠強權。掠奪伊拉克的油源、藉著控制阿富汗與伊拉克控制裏海與波斯灣油藏、對聯合國等各種多邊協商的國際機構嗤之以鼻，這種種行徑不只是無理性的蠻橫，而是向全世界所有可能威脅美國壟斷資本的競爭者宣告：霸主在此、逆我者亡！

如果時光倒流兩三年，在美國開始這一系列強橫的侵略之前，或許我們可以試問：美國霸權的維繫難道不能靠一些更和平、更文明的辦法？難道美國的意識型態霸權及其主宰的市場經濟不是早已深入到全球的每個角落？為什麼霸主不「持盈保泰」，非得動刀動槍不可？

這些問題現在都已經是純粹假設性的。從布希上台開始，或許更早，從90年代末以「反全球化」為名的全球反體制運動聯盟逐步登上舞台開始，美國為首的全球壟斷資本的意識型態迷障就愈來愈不靈光。侵略伊拉克的戰爭更使得美國當權派除了強權之外幾乎一無所恃。往年用以凝聚國內支持的民主機制早已被布希政權踩在腳下；「大量毀滅性武器」的情報騙局被揭穿之後，布希與布萊爾爾兩個政府現在連基本的誠信都談不上；聯合國與國際法體系被美、英兩國踐踏拋棄之後，靠著多邊協商調和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利益與步調愈來愈困難。對於美國統治階級來說，要維繫其所主宰的現存秩序，暴力已經成為最可靠的工具。而對所有反對侵略戰爭的世界人民來說，我們終究必須面對的嚴肅現實是：我們不可能反對暴力，而不反對依恃暴力而活的體制。◎

稿約

《批判與再造》旨在提供一個用左翼觀點曠觀寰宇、立足本地的公共論壇。我們

歡迎引介世界思潮、評析國際與中國兩岸政治經濟形勢及社會文化現象、回顧反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文章，與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創作。同時也期望不同觀點之間開誠布公的論辯，以有助於釐清觀念、深化認識，促成左翼力量的團結進步。因此，我們衷誠盼望各方朋友來稿，充實《批判與再造》的內容，推動台灣左翼以至世界左翼聲勢的再興，抑止人類處境的進一步惡化。

我們的徵稿原則如下：

- 一、文字講力求簡潔、扼要，一般以5,000字以內為宜。
- 二、理論文章以10,000字為度，特殊狀況不在此限。
- 三、論述文章務必觀點明確、邏輯嚴謹，秉持實事求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原則，切忌空談論調對牛彈琴，或迴避議題，意不及要。
- 四、我們充分尊重所來稿的觀點，但同時須維護稿體，倘在不損及原稿本意下，對構刪改。恕不個別改寫，請註明。
- 五、本刊因經費所限，無從提供稿酬，敬請見諒。

透析 金權政治

■ 林宗理

-----資本主義國家機器與資產階級

工業在資本主義基礎上迅速發展，使勞動群眾的貧窮和困苦成了社會的生存條件。現金交易，如卡萊爾說的，日益成為社會的唯一紐帶，犯罪的次數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說，以前在光天化日下肆無忌憚地幹出來的封建罪惡雖然沒有消滅，但終究已經暫時被迫收斂了，那麼，以前只是暗中偷著幹的資產階級罪惡卻更加猖獗了。商業日益變成欺詐，革命的箴言“博愛”在競爭的詭計和嫉妒中獲得了實現。賄賂代替了暴力壓迫，金錢代替了刀劍，成為社會權力的第一槓桿。初夜權從封建領主手中轉到了資產階級工廠主的手中。賣淫增加到了前所未聞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樣仍然是法律承認的賣淫形式，是賣淫的官方的外衣，並且還以不勝枚舉的通姦作為補充。總之，和啟蒙學者的華美約言比起來，“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恩格斯這段話生動地描述了歐洲從封建社會轉型為資本主義社會後的社會經濟狀況。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學者舉起“理性”的大纛，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權”、“正義”的崇美詞藻，號召人民起來打破封建貴族的特權，摧毀君主專制的枷鎖。新興的工商資產階級宣稱本身特殊的階級利益代表了全社會的普遍共同利益，以所有被統治階級的代言人自居，聯合小資產階級、工人、農民奪取了政權，鞏固了資本主義制度。然而，資本主義制度確立後，啟蒙學者與資產階級所許諾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的幸福王國並沒有實現。“自由”成了資產階級剝削工人、農民的特權，“民主”其實是資產階級運用經濟優勢獲得統治權力的手段，社會的貧富差距在自由市場經濟下不斷擴大，“平等”根本無從談起，廣大的勞動群眾經常遭受失業的威脅，連最基本的生存權也岌岌不保，更遑論更高層次的公民權利。其結果用哥德的話來說，就

是：“理性化為無稽，幸福變成苦痛”。

台灣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經濟上的“自由化”、“國際化”給予私人資本愈來愈大的活動空間，私人壟斷資本也日形壯大，政治上的“民主化”則使金錢與權力的交易日益猖獗，資產階級在各種選舉中通過資助代理人或親自參選，與政客聯手主導了政治、經濟之大權。

在戒嚴時期，反對運動的主導勢力與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把長期掌控政治、經濟大權帶有半封建性質的國民黨專制政權，視為萬惡的淵藪，似乎政治經濟的特權壟斷、財富分配的日益不均、環境污染的惡化等等重大問題，其罪皆在國民黨的特權與不民主。十幾年間，“自由化”、“民主化”喊得震天價響，“民主”、“自由”蔚為台灣主流的意識形態，成了包醫台灣百病的萬靈丹，似乎只要“自由”了、“民主”了，便萬事大吉，台灣人民從此可以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政權輪替了，只是「金」如舊

不過，事實不然。解嚴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政首長與議會，乃至總統，陸續全面開放民選，隨之而生的是金錢與權力相互為用的金權政治：“股票換鈔票，鈔票換選票”，金錢轉化為權力，權力再增殖更多的鈔票、股票。戒嚴時期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在“民主”的外衣下，轉化為金權政治，統治形式雖有所變化，但少數人壟斷政治、經濟利益的實質則沒有改變。不同的是，原來受專制政權哺育而俯首貼耳的資本家，如今以金錢影響政治，昂首闊步，登堂入室，公然與民選的大小政客坐地分贓了。金權政治的根源本在於資本主義體制，但在李登輝執政時期，卻仍被簡單地歸罪於國民黨政權。不少飽受“民主”、“自由”的意識形態催眠、不知資本主義為何物的蚩蚩之氓與知識份子天真地以為所謂“黑金”、“金權”是國民黨的專利，只要政黨輪替便可革除金權政治之弊，迷信民進黨的“改革”口號，竟幻想與國民黨同屬右派的民進黨上台後可有一番新氣象。民進黨執政三年多來的表現，無情地打破了這種可憐的幻覺。“政商勾結”、“利益輸送”、“特權特惠”、“權位分贓”，這些金權政治的痼疾，非但沒有稍癒，反而變本加厲，更形徹底露骨地展現無疑了。台灣的“民主化”折騰了多年，由兩蔣的威權體制轉為李登輝的“黑金體制”，再換成陳水扁的“白金政治”，政權輪替了，只是“金”如舊。

諷刺的是，在政權易手，朝野換位後，國民黨與親民黨的泛藍系統忽焉成了抨擊金權政治的急先鋒，以揭發民進黨政權圖利財團、掏空國庫為能事，似乎一夕之間，頓悟前非，洗盡“金”華，與備受官商聯手侵漁的庶民百姓同在了。於是，我們便見到了一幕幕的台灣政治鬧劇：泛藍指責民進黨“白金”當道，民進黨則聯合“黑金教主”李登輝及其走卒台聯黨高嚷泛藍企圖“黑金復辟”，雙方你來我往，互揭瘡疤，用的都是金戈銀槍，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好不熱鬧。究其實際，則是半斤八兩，同為一丘之貉，不過是兩個右派政黨的兄弟鬩牆之爭。

對於金權政治，民眾早已積怨多年，主流媒體也多所批評，但所論大抵僅見表面現象，矛頭所向是個別政客、資本家或黨派。有些右派學者則援引美國保守派經濟學者的“尋租理論”（rent-seeking theory）來解釋金權政治的成因，倡導政府與資本家建立“夥伴關係”，或者以為只要制定“政治獻金法”、“利益迴避法”、“遊說法”之類的法律便可遏止金權政治。這些非但是皮相之見，甚至是誤導民眾視聽，充當資本主義制度辯護士的論調。這些右派人士只會照搬歐美、日

本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右派理論與制度，卻視而不見他們心儀、膜拜奉為圭臬的國家正是典型的金權政治。台灣近二十年來的政治、經濟發展，所謂的"自由化"、"民主化"，不過是忠實卻又粗劣地模仿、複製美國模式。他們尊為典範的宗主國的金權政治早已臭名昭著，為其本國的有識之士斥為腐敗透頂。今天台灣民眾所詬病的「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圖利財團」、「權位分贓」等金權政治弊端無不在美國大行其道，台灣的右派卻還盲從其後，其不長進如此，真令人驚詫！（註一）

國家政權的起源

其實，金權政治正是資本主義民主制的本質特徵，而非其異常表現或偶發狀態。為什麼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必然表現為金權政治？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State theory）加以剖析，便可得到最深刻透徹的認識。

先須說明一點，一般政治學教科書所定義的國家（nation 或 state），是指具有領土、人民、政府的主權國家，而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所說的國家（the state）就其狹義而言，是指由統治階級控制的行政體系，司法，軍隊，警察，監獄（以及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議會）用來控制被統治階級的統治機器。曾任義大利共產黨總書記的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認為統治階級要使人民甘心服從領導，除了依靠上述屬於國家政權機關的物質工具加以壓制外，還必須透過教會、學校、工會、政黨等這類民間社會的組織，灌輸被統治階級一整套符合統治階級利益的思想、道德、價值觀，以掌握知識、思想、文化的主導權（hegemony），控制被統治階級的意識，使其甘於臣服統治。換句話說，一方面用強制的暴力鎮壓肉體，另一方面用思想的教化馴服心靈，雙管齊下，才能確保統治階級的權威。因此，葛蘭西統合了文武這兩項要素把國家（the state）的定義擴展為：由強制暴力的盔甲所護衛的思想主導權（見Gramsci 1971：263），日後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大多吸收了葛蘭西這個觀點。

國家政權（或說國家機器）不是人類社會固有的。在由血親氏族構成的原始社會中，生產力仍很低下，氏族成員共同進行生產勞動，共同分配勞動成果，社會成員之間沒有貧富貴賤的階級劃分。社會的公共事務由全體成員議決管理，領導人也由所有成員選舉產生，人與人之間的爭執根據習俗規範裁決，抵禦外侮的責任則由全民的武裝力量來承擔。在這種共產的原始民主制中，人人平等，沒有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別，因此也就不需要設立官吏、司法、軍隊、警察、監獄這些用來壓制被統治階級的國家機器。但在勞動工具由石器進展到鐵器，社會的勞動分工逐漸發展，勞動生產力也日益提高後，部落的財富增加，部落之間開始交換彼此富餘的產品，或以戰爭征伐掠奪異族部落的財富，無階級的部落社會便開始衰亡。勝利的部落的領地與財富擴大了，被征服的氏族淪為奴隸，社會便分裂為主人和奴隸、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兩大階級，從而打破了公有制，確立了私有財產制。為了處理因社會分工擴大、工商業日益發達而複雜化的公共事務並鎮壓被統治階級的反抗，這才產生了由統治階級掌控的國家政權。用恩格斯的話來說就是：

「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級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駕於社會

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由於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衝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佔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國家首先是奴隸主用來鎮壓奴隸的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用來鎮壓農奴和依附農的機關，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是資本剝削僱傭勞動的工具。」（恩格斯 1972 [1884]：166，168）

國家的本質與作用

恩格斯這段話道出了國家政權的本質，是馬克思主義對國家的經典定義。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可簡要闡述如下：

1. 在原始共產社會衰亡，社會發生階級分化，私有財產制確立後，隨著社會分工的擴展與階級對立的發生，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有了矛盾，這時就需要設置專職官吏、司法機關、警察、軍隊、監獄等等構成國家機器的公共權力機構來管治社會，維持社會秩序，於是國家政權就以代表社會共同利益的姿態壟斷了合法使用強制力與徵稅的權力而君臨社會之上，並追逐本身的特殊利益，由社會的公僕變成了社會的主人。
2. 國家雖然聲稱保護“全民”的“普遍”公共“利益”，但在存在階級差別與對抗的社會中，不同的階級都力圖奪取國家的政權來保障、擴大本身的利益，結果一般都由最強大的、經濟上佔優勢的階級奪得政權，把本階級的特殊利益說成是社會的共同利益，斥責不服其統治、挑戰其權威者為危害“秩序”的社會公敵，運用國家機器加以鎮壓。因而，階級社會中的國家政權通常是統治階級壓制被統治階級的工具。
3. 私有制的階級社會的國家政權依照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採取了不同的形式。人類為了生存就必須生產出滿足食、衣、住、行的需求的物品。每個社會都靠勞動者運用生產工具開發自然資源或人造的原料製造出這些生活必需品。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即：生產工具和土地、原料這些勞動對象）的關係，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各不相同。例如：在奴隸時期，奴隸本身是生殺大權操於奴隸主之手的活「工具」，當然更不可能擁有鋤頭、犁牛、土地這些生產資料，奴隸只能在奴隸主的強迫下使用主人所擁有的生產資料進行生產，而所有的勞動產品，歸主人支配。在資本主義時期的工人，雖有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但也不具備生產資料，他要生存就必須受資本家僱傭，使用資本家私有的機器、廠房、原料才能進行生產，產品歸資本家所有，工人僅獲得維持生存的工資。因此，依據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不同方式，就區分出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與財產所有制。在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上，也就產生不同形式的階級關係與國家政權的形式。這些不同形式的國家政權的主要職責就是維護由統治階級支配的社會經濟結構與財產所有制。國家政權一方面提供有產階級生產活動所必須的共用生產條件，例如大型水利工程、運河、公路等；另一方面則一手運用軍、警、司法監獄等國家暴力機關壓制被剝削階級，使之不敢反抗，一手運用教育機構、宗教等灌輸人民符合統治階級利益的思想意識（例如：封建專制時期的忠孝節義，資本主義時

期的"自由"、"民主")使之認為統治階級與國家政權的支配是合理、正當的。這樣，國家政權就可以鞏固社會經濟結構，為統治階級創造有利於剝削被統治階級的政治經濟條件，不致讓階級對抗破壞社會秩序，動搖階級統治的基礎。(以上參見馬克思與恩格斯1972〔1845-1846〕；馬克思1980〔1857-1858〕，1975；恩格斯1972〔1878〕，1972〔1884〕，1972〔1886〕)

必須運用辯證法才能了解唯物史觀

基於上述觀點，馬克思與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的國家政權「不外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家內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採取的一種組織形式」(馬克思恩格斯1972〔1845-1846〕：69)。恩格斯進一步闡釋說：

「現代國家都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恩格斯1972〔1878〕：318)

「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這一切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恩格斯1972〔1891〕：336)

必須特別指出的是，上述這些觀點，只是馬克思、恩格斯根據歷史唯物論，對由奴隸制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政權的性質與作用的一般性概括，絕不能當做抽象的公式直接套用在國家問題的具體研究上。恩格斯指責在馬克思生前，就有不少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由於不懂得唯物辯證法與思想上的怠惰，把歷史唯物論當成公式、教條胡亂貼到各種事物上，事實上是把唯物史觀「當作不研究歷史的藉口」，導致唯物史觀「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見恩格斯1890年致康·施米特與約·布洛赫的信)。科學的理論從複雜萬端的現象中捨棄偶然、例外的東西，找出規律、通則，是為了抓住事物的本質，以便深刻、準確地掌握事物，但絕不忽視、否認偶然、例外的存在，在辯證法中，現象與本質、偶然與必然、例外與通則、特殊與普遍，本是既對立又統一的。但長期以來，許多不論是接受唯物史觀或反對唯物史觀的人都未能了解這一點，以至產生諸多混亂的觀點與無謂的爭議，在有關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上也不免乎此。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唯物史觀認為，隨著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關係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人類社會根據是否佔有生產資料劃分為統治階級與被剝削階級，這些不同階級在經濟生產中的關係構成的經濟結構，就成了政治、法律與思想、道德變化發展的基礎。因此，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經濟是基礎，是決定性的因素，而國家政權、政治制度則附屬於經濟的生產方式。國家政權是為維護、鞏固在經濟生產中佔支配地位的統治階級的利益而服務的，是統治階級用來馴服被統治階級最有效的機器(見馬克思1972〔1859〕；恩格斯1972〔1878〕，1972〔1884〕，1972〔1886〕)。

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誤解

由於唯物史觀強調了經濟基礎對國家政權的制約作用，以及國家政權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工具性，遂使不少人誤以為在歷史唯物論中，第一，國家機器必須由在經濟上佔優勢的統治階級

親自掌握，第二，國家機器相對於經濟基礎僅是消極、被動的，不會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積極影響經濟的發展，國家機器的官僚也沒有本身特殊的利益。因而，在國家與統治階級的關係及政治與經濟的關係上，發生了長期的熱烈爭論（註二）。

其實，如果懂得馬克思與恩格斯唯物辯證的思想方法，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諸多誤解便可輕易廓清。辯證法與機械論思維方式的根本區別就在於：機械論把事物看成是由分割開來、互不聯繫的片段零件機械地組合起來的，而辯證法則認為事物是由相互作用的不同要素構成的有機體。在構成有機總體的各個部分之間，固然有主要與次要之別，但又都以他方為本身存在的條件，而各部分之間的主次關係也會因具體條件的變化而發生轉換。用辯證法來認識唯物史觀，便可知作為社會基礎的經濟結構與作為上層建築的國家政權是互為存在條件的，國家政權的形式固然由經濟結構的變化衍生而出，但經濟結構也賴國家政權才得以鞏固，國家的政策也影響經濟發展，在階級鬥爭激化，政爭熾熱因而破壞了社會穩定，嚴重干擾了經濟生產時，國家政權能否恢復社會秩序，更是成了經濟結構能否維持的決定性因素。正如列寧所說，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靈魂就是「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分析歷史與現實的政治經濟問題時，總是根據具體的條件，運用歷史唯物論的原理與辯證法，來論述政治與經濟、國家政權與統治階級之間的關係，從不套用公式（註三）。這明顯地表現在他們評述法國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國與德國俾斯麥時期的國家政權與經濟發展的著作上（馬克思1972〔1850〕，1972〔1852〕，1972〔1871〕；恩格斯1972〔1870〕，1972〔1872〕，1972〔1884〕，1972〔1891〕）。

從上舉的著作中，可以看出馬克思與恩格斯論述某個主權國家的國家機器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形式與作用時，其方法是：一、把該國放在世界政治經濟體系內，考察該國的國際政治、經濟關係；二、分析該國的生產方式與經濟發展階段所形成的各種階級勢力及其相互關係；三、從該國各階級間的鬥爭導致的階級的勢力消長，說明國家政權與各階級的關係及其表現形式（即：是君主立憲制或議會民主制或獨裁制）；四、指出經濟因素對於階級鬥爭與國家政權的影響，以及國家政權對經濟發展的作用，這裡沒有一丁半點“唯經濟決定論”（economicism）與“經濟歸原論”（economicreductionism）的影子。

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政治經濟職能

總結上述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闡釋，我們可以得知：一、恩格斯所說的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不論形式如何，都是「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是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工具」，並不意謂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一定要由資本家親自當權執政。資產階級是否親掌政權取決於歷史因素、經濟狀況、階級鬥爭的結果與國際的政治經濟形勢。因而，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也可能相對獨立於資產階級的控制。不論資本主義國家機器是否由資產階級直接掌管，它總要執行恩格斯所說的一般國家職能，即緩和階級的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範圍以內」，使「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緩和階級衝突可以用專制形式（如波拿巴政權、法西斯政權），也可以用社會福利國家的形式（如二戰後的西歐），只要能緩和階級矛盾，維護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使資本家得以在雇傭勞動制度下繼續剝削工人，就符合整個資本家階級長期的利益，國家機器也就執行了「資本家的

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的職能，從而國家機器的高階官僚也能繼續從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中獲取豐厚的薪金並從各種門路揩得油水。恩格斯對波拿巴政權的描述，很可說明具有相對獨立性的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特點：「路易·波拿巴在一方面借口說要保護資產階級反對工人，另一方面又借口說要保護工人反對資產階級的名義下，奪去了資本家的政權；但他的統治同時又便利了投機事業與工業活動，簡言之，使整個資產階級的經濟繁榮與發財致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過，得到更大程度發展的還是貪污舞弊和普遍盜竊行為，它們以皇帝作為中心，從這種發財致富當中抽取巨額的紅利。」（恩格斯1972〔1891〕：327）。

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作為“理想的總資本家”的本質，除了表現在緩和階級衝突的政治職能外，還呈現在其經濟職能上。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經濟職能會因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有所變化，但大體說來為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會：一、提供一般的生產條件，即：水、電、公路、鐵路、港口、機場、郵政、電信等基礎設施；二、興辦教育、支持基礎科學研究與尖端的科技研發、開發工業區與科學園；三、出現失業、通貨膨脹的經濟危機時，運用貨幣與財政政策穩定宏觀經濟，避免經濟崩潰，引發政治危機；四、保護本國特定產業並拓展外銷市場，破除對外投資障礙，以利資本輸出，加強本國資本的國際競爭力。這些經濟政策無不是利用國家預算圖利資本家。第一項是所有企業進行生產的必要物質條件，但或因興建所需的資本額過大，私人資本無力負擔，或因無法獨佔使用，社會利益高於私人利益（即資產階級經濟學所說的「公共品」）而無利可圖，遂由國家出資興建，以低價提供企業。不過，只要私人資本壯大到有能力承擔建造且有厚利可圖，即可交由私人資本經營，近年台灣的高鐵委由私人資本興建，與中華電信、台鐵的私有化政策即是例證。第二項的高科技研發（如：核能、航天、電子、生物等）所需經費龐大、時間長且成果難以預期，遂由國家承擔資金與風險，再將研究成果轉移私人資本。工業區與科學園區則是國家為私人資本提供良好、低廉的生產環境。教育即是對勞動力的培訓，本屬勞動力的生產費用，但因其外溢的經濟效果大，具公共品的性質，其費用主要也由國家支出。這兩大項的國家支出無不有利於降低資本家的生產成本，提高企業的利潤，促進私人資本積累。第三項挽救經濟危機的措施，目的在從總體上維護資本主義經濟於不墜。在經濟蕭條、總需求不足時，國家興建公共工程，並向私人企業大量採購生產過剩的產品，即為私人企業創造市場，提供獲利機會。

為什麼資本主義國家機器是資本家的國家？

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之所以充當“理想的總資本家”主要是因為在結構上資本主義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經濟活動主要由資本家掌握資本、勞動力、土地這些生產要素來進行生產、交換，私人資本的積累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而國家機器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向利潤與工資徵稅，在國庫困窘時，還須向民間舉債，國家機器的運行與官僚的收入不能不高度依賴私人資本的積累。於是，維護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再生產，在國內與國外促進私人資本的積累，推動經濟增長，乃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第一要務。

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下，行政首長與議員皆由選舉選產生。由於選舉所需的廣告、宣傳、人事、行政各項費用日趨龐大，候選人與政黨往往須向資產階級募集競選費用，得到大量捐助的候選人與政黨自然勝算較大。勝選後的行政首長與政黨把國家行政資源當成戰利品，論功行賞、分

官授爵，大肆進行權位分贓，資產階級或其代理人往往因此得以取得高官厚祿，與聞決策，最典型的就是美國的「分贓體制」(Spoils system)。在立法部門，資產階級同樣可以通過親自參選或選擇代理人進入議會，並在制訂、審查法案時，以利益遊說、施壓，使有利於己的法案通過。於是所謂「利益輸送」、「權位分贓」、「官商勾結」的戲碼或明或暗無不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頻繁上演。整個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當然要大受資產階級的左右(註四)。

在右派政權政績不佳、經濟衰退、過度忽視中下階級人民的利益而民怨加深時，改良派的中間偏左政黨也可取得政權，通過財稅政策實行收入再分配，加強社會福利措施。這看似會傷害資產階級的資本積累，但其實是國家機器安撫中下階級的不滿，為資產階級支付社會保險費用，協助穩定資本主義秩序，以保持資本剝削勞動的雇傭制度的作為。一待國家財政不堪負荷，資產階級也以不願投資相威脅，這類麻醉止痛的藥方即告失靈，此所以西方社會福利國家制度崩塌，而英國工黨、法國社會黨、德國社民黨的經濟政策也紛紛右傾之故。

出路何在？

經過上述的分析，回頭再看台灣的金權政治便可了解癥結所在。台灣在兩蔣的戒嚴期，金權政治之所以沒有全面浮現，有幾個因素：一、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初，直接從大陸帶來一個龐大的黨、政、軍、特人員組成的國家統治機器，接收了日本遺留下的工、商、金融企業，轉為官營與黨營企業，又有美國巨額的經濟、軍事援助，故而在政治、經濟上掌握了絕對支配權。二、從階級關係來看，農村的地主階級在「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下遭到鏟除，新生的小農階級對國民黨感恩德，只是在「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政策損及農民的利益後，在八〇年代才出現大規模的抗議之聲。大資產階級則靠國家機器哺育茁壯，並無對抗之心，也無主導政策之力。工人階級在戒嚴體制下遭到嚴密控制，又受到傳統意識形態的束縛，左翼的思想、力量復被鎮壓殆盡，也就難以起而抗爭。故而國家機器在八〇年代之前可謂君臨台灣社會之上，享有不受制約的高度自主性。三、在威權體制下，所開放者為地方選舉，中央民代僅有局部小額的增補選，權力與金錢的交易局限在地方派系。解嚴後，威權不再，新興的資產階級如脫柙猛獸，可以意氣風發、肆無忌憚地高視闊步了。台灣從經濟到政治體制更徹底的資本主義化，從中央民意代表到省市長、總統逐步開放民選。每次大選競爭激烈，選舉經費不斷攀升，政客、政黨紛向資本家尋求金錢奧援，資產階級也視參選或挹注資金為政治投資，冀圖憑藉經濟優勢左右國家機器的政策與法案，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金權政治遂大肆泛濫。1990年李登輝公開宣示：「政府的責任就是為資本家賺錢」，很能說明台灣的國家機器與資產階級的關係已進入一個新紀元。

面對當前日益惡化的金權政治，恩格斯在1884年的一段話，應可供我們深加思考：

「有產階級是直接通過普選制來統治的。只要被壓迫階級——在這裡就是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這個階級的大多數人就仍將承認現存的社會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為資本家階級的尾巴，構成它的極左翼。但是，隨著無產階級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為獨立的黨派結合起來，選舉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選舉資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選制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在現今的國家裡，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不過，這也就足夠了。在普選制的溫度計標示出工人的沸點的那一天，他們以及資本家同樣都知道該怎麼辦了。」(恩格斯1972〔1884〕：169-170)◎

1. 恩格斯在1891年為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單行本寫的導言中說：「正是在美國，"政治家"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厲害地構成國民中一個特殊的和富有權勢的部分。那裡，兩個輪流執政的大政黨中的每一個政黨，都是由這樣一些人操縱的，這些人把政治變成一種收入豐厚的生意，拿合眾國國會和各州議會的議席來投機牟利，或是以替本黨鼓動為生，而在本黨勝利後取得相當職位作為報酬。……我們在那裡可以看到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職掌政權，用最骯髒的手段為最卑鄙的目的運用這個政權，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個大的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統治和掠奪國民的。」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335)
恩格斯百餘年前的這個論斷並沒有過時，依然準確地道出了美國政治的實相。在美國，揭露美國金權政治的著作所在多有。這裡僅舉較為著名的兩本，供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參考：Etzioni, A. 1984; Thomas R. Dye and Harmon zeugler (1996)。
2. 西方學界自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展開了關於國家理論的長期爭論。這些爭論雖然對釐清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不無裨益，也做了一些有意義的補充，但大部分的爭執其實都出於對馬克斯與恩格斯的國家觀點的誤解。評析這些爭論的意義需另有專文，而非本文主旨，故在此略過不提。這些爭論的主要觀點，請參閱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 eds. (1978); R. Miliband (1977, 1983); N. Poulantzas (1973, 1975, 1980); Block, F. (1989); S. Clarke. (1991); C. Offe (1984); B. Jessop (1982, 1990); P. Evans, D. Rueschemeyer and T. Skocpol eds. (1985)。
3. 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約·布洛赫的信中說：「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決的主要原則，並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預交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但是，只要問題一關係到描述某個歷史時期，即關係到實際的應用，那情況就不同了，這裡就不容許有任何錯誤了。可惜人們往往以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還並不總是掌握得正確，那就算已經充分理解了新理論並且立刻就能夠應用它了。在這方面我是可以責備許多最新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這的確也引起過驚人的混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479)
4. 1950年代美國總統艾森豪曾說美國政府官僚、軍方與軍火工業構成的"軍事—產業複合體"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主導了美國的重大政策。1997年全球金融風暴後，美國著名的自由貿易經濟學者巴格瓦蒂 (Gagdish Bhagwati) 也指出，美國的財政部長大多出身華爾街的金融大亨，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 與世界銀行的決策者也與金融界水乳交融，因此形成"華爾街—財政部複合體" (Wallstreet-Treasury complex)，主導了美國乃至世界的金融政策。目前美國小布希政權更是眾所週知的石油幫。

參考書目舉要

- 馬克斯與恩格斯 (1872 [1845-1846]) 〈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馬克思 (1972 [1850]) 〈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72 [1859]) 〈政治資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72 [1850]) 〈1848年至1850年的法西斯階級鬥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72 [1852])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 (1972 [1871]) 〈法西斯內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72 [1875]) 〈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80 [1857-1858]) 《經濟學手稿》下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
- 恩格斯 (1972 [1872]) 〈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72 [1870, 1874]) 〈德國農民戰爭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72 [1878]) 〈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72 [1884])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72 [1886]) 〈路德維希一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Block, F. (1989) *Revising State Theo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Clarke, S. (1991) *The State Debate*. London: Macmillan.

Dye, Thomas R. and Harmon Zeigler (1996) *The Irony of Democracy*. Ver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Etzioni, A. (1984) *Capital Corruption*.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Evans, P. R., Rueschemeyer, D. and Skocpol, T., eds.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Holloway, John and Sol picciotto, eds. *State and Capital*.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Jessop, B. (1982) *The Capitalist State*.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 (1990) *State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2002)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Miliband, R. (1969)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N.Y.: Basic Books.

—— (1977) *Marxism an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3) *Class Power and State Power*. London: Verso.

Offe, C. (1984)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Poulantzas, N. (1973 [1968])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 (1975)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 (1980 [1978])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揭開

韓國的金權政治史

韓國自1987年結束軍事獨裁統治，進入民主化時代之後，韓國社會陸續揭穿了兩位前總統全斗煥、盧泰愚、兩位總統兒子金賢哲（金泳三之子）、金弘一（金大中之子）貪瀆案件，最近金大中透過「現代集團」賄賂北韓最高當局的案件也搬上了司法審判台。重大貪污案件一件件地揭露，似乎顯示了韓國政界肅貪的可能性，但現實在上，卻始終未能有巨大的進展。

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相互勾結，在韓國主要是以政治權力提供銀行超額貸款、分配外國貸款、核發事業許可、發包政府相關公程、採購等方式提供優惠，而受惠企業則報以金錢代價的方式進行。

李承晚時代的官商勾結 (1948~1960年)

此時期最主要的官商勾結途徑是結束日本殖民統治後的日本敵產處理、美援物資、資金的分配、銀行貸款的分配。1945年日本戰敗之後，美國進駐南韓，實施了三年的美軍政統治，此期間美軍政廳為了在南韓培植親美資本家階級，確立南韓的資本主義體制，先將日本敵產予以管理後，擬定賣給私人的政策方針。1949年李承晚政府制定「歸屬財產處理法」，以只有當時市價50~

60%的價格，賣給友好人士，並且給予最高15年長期低利償還優惠。以當時通貨膨脹嚴重的情況來看，此種方式幾乎等於無償贈予。

在美援方面，1953年到1960年間，南韓共接受了20億美元的援助物資，當時美元的黑市價格比公定匯率高出一倍，因而有權取得美援物資承購權就立刻可以獲得一倍的利潤。由此產生的利潤約有三分之二由少數當時的大企業所取得。另外，取得銀行貸款並獲得貸款利息補助亦是重要的舞弊途徑。綜觀此資本積累原始期，資本主要不是靠發展生產力，而是靠與政治權力的良好關係，獲得利益，進行原始資本積累。1950年代，大企業是很明顯地依附於政治權力，它們因為當時仍處於原始積累階段，因此，要求的是立即的獲利，而獲利的一部份則獻給政治權力者。

朴正熙時代的官商勾結 (1961~1979年)

靠著軍事政變上台的朴正熙，把軍事政變美其名為「軍事革命」。在其革命形象下，為了要安撫民眾對李承晚政權貪污腐敗的不滿，一上台後立即以「不當蓄財」之名，逮捕了各重要企業的企業主，但一個月後，各企業者就獲得釋放，原本查出的追討金額也大幅縮

■ 臧汝興

水。朴正熙算是一上台就給了財團一個下馬威。

缺乏民眾支持基礎的朴正熙，實施「開發獨裁」企圖實現以大企業為中心的經濟發展，因此，朴政權對市場採取了直接的、強制的、選擇性的介入方式。於是，與政府維持良好關係，成為企業成敗與否的決定性因素。

朴正熙收受賄賂的途徑大致可分為：引進外資分配給大企業，讓大企業從中賺取高額的貸款利息差（當時國內的利率約17.5%~26.0%，而國外利率只有5.6%~7.1%）、宣布「8·3措失」（凍結一切民間高利貸，讓企業債務遽減）、發表「重化學工業宣言」（選定鋼鐵、機械、造船、煉油、電子、非鐵金屬等六項產業為國家重點培育產業），提供投入該產業的企業政策性貸款。

在朴正熙高壓統治的十八年間，由於始終缺乏民眾的支持基礎，因此，不得不使用大量的「統治資金」維持其統治。「統治資金」主要用於總統競選經費、支援黨內候選人選舉經費、收買反對派人士，以及收買軍方高級將領以防他們發動政變等。當然，也有很多錢進入了權力者的私人口袋。不過，朴正熙十八年獨裁統治期間，到底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始終是個謎。目前，朴正熙唯一的兒子朴志晚，在一個不大的公司掛名副董事長，曾數度以煙毒犯的罪名被捕，經濟生活不如一般預期。據說朴志晚的生活，主要是靠朴正熙當年的政變伙伴金鍾泌照顧。

另外，朴正熙收受的賄賂中也有一部份是來自日本的。據1996年三月美國CIA發表的「韓日關係的將來」報告書

中指出：「有人指責民主共和黨收受日本方面的政治資金，是有相當根據的。」

全斗煥時代的官商勾結 (1980~1988年)

1980年代初，在企業經濟方面最大的變動就是政府推動的重化學工業投資調整政策與「不實企業整理」（讓特定企業併購經濟不善之企業）。在重化學工業投資調整方面，政府只准許「現代」與「雙龍」兩家公司生產柴油引擎；汽車則以排氣量為基準將市場分割給少數幾個汽車廠；將原本的四家電子交換機生產公司，強制合併為「三星半導體通信」與「金星半導體」。

在企業的併購方面，併購企業不但能以低價併購，而且還可以獲得政府的低利貸款、負債減免等優惠。因併購企業而產生的利益，以當時匯率計算約達數百億台幣。

透過以上過程，韓國經濟的資本更加集中，財團與政權間的勾結關係也更加緊密。1995年，即為全斗煥卸任後的第七年，被以貪污罪名判刑，在審判過程中，查出全斗煥共收受高達9500億韓幣（約合台幣300億）的賄賂，其中向「現代集團」鄭周永收受220億韓元；「三星集團」李秉哲收受220億韓元；「大宇集團」金宇中收受150億韓元，據檢方表示這些錢與高速公路建設、次世代戰鬥力研發、半導體事業有關。

這些錢的用途一部份是用在政治權力的維護方面，全斗煥拿出了1974億元給參選下屆總統選舉的盧泰愚做為選舉經費、900億元用於其任內兩次國會議

員選舉時支援同黨候選人、約1000億元用於黨部運作費用，當然也有一部份進入了全斗煥個人口袋。

盧泰愚時代的官商勾結 (1988~1992年)

1987年六月民主化抗爭之後，韓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相關條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此也造成了政權與財團關係的巨大變化，明目張膽的包庇、修改法律以圖利財團的事情變得難以進行。1988年財團團體「全國經濟人聯合會」公開發表：「往後企業界將公開募集政治資金，並將只分配給擁護自由市場經濟的政黨」。這意味著財團將不再看政權眼色，被動獻金，而要以資金為媒介主動影響政權。1991年，執政黨與金泳三領導的統民黨、金鍾泌領導的共和黨合併為民主自由黨，建立保守大聯合體制，一定程度上也是呼應財團的要求。不過，這也並不表示財團的獻金都與要求特定事業的特權無關。1995年盧泰愚以貪污及叛亂罪起訴後，檢查官查出盧泰愚在任內共收受了五千億元（約合台幣一百五十億），其中重大的收賄案件有：瑞西地區三萬餘坪的土地用途變更案、軍購案（包括國際公認的3~5%的回扣在內，收受約10~20%的回扣）、核電廠三、四號機發包案等。值得注意的是，盧泰愚接受的賄款中有一部份流向當時最大在野黨總裁金大中。金大中坦承將這筆錢分送給了自黨國會議員。

全斗煥、盧泰愚兩位前任總統於全泳三時代被起訴定罪，但兩年多以後就獲得特赦、復權，同案被不扣押起訴的七名財團主，也獲得赦免、復權，全案

雖在社運勢力與國民輿論的壓力下，在查明真象上獲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最終卻以政治方式解決。

金泳三、金大中時代的官商勾結 (1992~2002年)

金泳三在總統選舉過程中，除面對最大在野黨金大中的挑戰之外，韓國最大財團「現代集團」董事長鄭周永也跳出來參加競選。最後鄭周永雖以17%的得票率敗落，但也象徵了已經具備獨自的資本積累能力的壟斷資本，不甘繼續受政權控制，開始直接挑戰政治權力。

因此，金泳三政權似乎無法再像過去的總統一樣，逢年過節就把財團主找來，按照財團排行順位，像是收保護費一樣的強索黑錢。不過，金泳三任內的1997年六月，他的兒子金賢哲被以逃稅及居間收財的罪名起訴。在調查的過程中揭露了金賢哲負責管理金泳三競選後剩餘資金，並將之委交兩家企業代為管理。除此之外，金賢哲也被懷疑在個人移動通信事業的投標案中舞弊。1999年金大中執政時期，金賢哲被判處兩年的有期徒刑，但不久，金大中竟不顧社會大眾的反對，赦免金賢哲。沒幾年，金大中的兩個兒子皆因關說收賄被起訴，或許這也是一種「將心比心」吧。

數十年來的官商勾結，雖然隨著韓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與政權性質的改變而有所改變或改善，但始終未能根除，其主要原因是，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內，金錢與政治權力必然勾串在一起，資本家與政客聯手主宰國家政策，分配政治經濟利益。不論政體是專制或所謂的民主都不會根本改變這一本質。◎

教改亂改

台灣焦點

張戡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的事

教育改革全世界都在進行，台灣近十年來
的教改，絕對不是一件新鮮的事，就連
其所發生的內容也了無新意。先拿距離我們最
近的日本為例，幾乎就在比我們早不了一、兩
年的時間裡，他們也進行了一次教改，讓我們
來看看學者們對他們教改的分析，會不會覺得
很眼熟。

下面筆者翻譯了三位學者研究日本教改所
發表論文的英文摘要：

(1)『九〇年代日本的教改：個人特質與其他
的不確定性』(Cave P.)

儘管海外的觀察家誇讚日本過去
二十年來的教育，可是在日本國內，
學校體系已經成為不滿漸增的焦點，
因為它被認為太僵化、千篇一律、只
重考試。這種不滿已經促成八〇年代
晚期到九〇年代的一系列教育改革的
建議和政策措施。這些改革一直在
「重視個人特質」的口號下進行，而
且目標刻意放在激發創造力上，方法
則是引介更多的自由權和選擇權進入
教育體系。然而，批評者聲稱，強調
個人特質只是個假面具，面具底下其
實是由企業需求所策動的新自由主義
學派的議題。……本文結論認為，日
本教育部在改革的途徑上，仍然戒慎
恐懼，至今主要的改革措施一直偏往
進步主義而非新自由主義的方向。

【比較教育學月刊第37冊第2集

173~191頁，2001年】

(2)『近代日本高等教育改革之回顧』(Doyon
P., 2001)

日本各黨各派不停地討論高等教
育改革已經超過了三十年，其中有許
多討論到了九〇年代終於落實，此時
「教育部大學會議」開始實行許多經
過七〇、八〇年代醞釀而提出的建
議。當日本進入二十一世紀時，其十
八歲的人口已經自一九九二年以來減
少了五十多萬，到二〇一〇年，將還
要再減少三十萬，因此加大了改革的
急迫性，尤其是那些漸漸開始招生困
難三流大學。……此外，企業界正需
要一批另類員工，希望他們截然不同
於日本教育體系所能製造出來眾所週
知的典型。最後一點，又有一代青年
人開始步入成年，他們生長在鼓勵消
費、物資豐富的環境裡，有著與父母
上一代完全不同的價值觀。本文旨在
檢視現有的高等教育改革運動，以及
其延續將近三〇年的歷史……。

【高等教育月刊第41期443~470頁，
2001年】

(3)『改革的鐘擺：90年代以後日本的教育變
革』(Shimizu K., 2001)

本文的目的是要描繪目前日本教
育改革的環境、性質、與衝擊，……
把焦點放在中、小學教育的課程與教
學，檢視教育改革對學校的實際衝

見怪不怪

擊。日本現在的教育改革的基本性質可以說是「教育的解除武裝」，因為要削減課程內容和減少教學時數，而強調廣泛地鬆綁整個教育體系，它正使得日本學校教育氣氛比以前大為軟化，有人說，結果造成學生教育成就的低落，並使不同族群之間的教育機會更加兩極化。日本的情形意味著未來其他國家教育改革的走向，尤其是亞太地區。

【教育變革季刊第2期，193~205頁，2001年】

從以上三位學者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出，許多在台灣的教改亂象，其實在日本也普遍存在的。例如，Cave P. 和Doyon P. 兩人都提到教改是為了滿足企業界的需求，有了企業界的金錢誘因，教改的動力自然強大多了，這正是台灣學者所應多所著墨的地方，要找出教改真正的藏鏡人，到底是哪些人獲利？如果是零和遊戲，那麼又是哪些人失利？沒有其他雙贏的辦法嗎？為何當日本的教育部被批評太戒慎恐懼，而台灣的教育部卻勇於嘗試，甘冒「懵懂躁進」的大不諱？

另外Cave P. 和Shimizu K. 兩人也都提到教育鬆綁的問題；Cave P. 認為教育鬆綁是為了自由權與選擇權，換句話說，就是讓教育市場化的問題；Shimizu K. 認為教育鬆綁造成學生學習成就低落，造成學習機會兩極化，換句話說，就是貧富學生差距拉大的問題。這些都是台灣這一波二次教改運動所熱烈討論的

議題。

還有，Doyon P. 個別提到就學人口減少，有些學校面臨招生不足的問題，以及Y世代成長環境優渥，價值觀迥異的問題，台灣也面臨完全一樣的窘境。難以理解的是，教育部明明知道戰後嬰兒潮的結束，各級學校有許多會面臨招生不足的問題，明明知道民間教改運動所要求廣為設立的是公立學校，卻仍然敞開大門讓私立學校紛紛成立，並逐步升格，而造成今天求過於供、品質低落的問題，真正的原因是什麼？當然不可能只單單為了解除聯考壓力。何況各類考試的壓力至今也並沒有真正地解除掉。如果教改無法解決舊的問題，卻衍生出許多新的問題，那豈不是害大家走了一趟既冤枉而又不能回頭的路嗎？

台灣教改如果放在全世界一波又一波的教改長河裡，它絕對不是一項創舉，其所產生的亂象也是司空見慣，一點都不新鮮，反倒是我們應該以別國教改的成功與失敗，作為典範或借鏡，斟酌自己的國情，謹慎推動改革，才能少走一些冤枉路。建構式數學的實施與喊停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根據政治大學教育系周祝瑛教授在其所發表新書『誰捉弄了台灣教改？』一書中，有一段清楚地描述：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美國教育部曾提出十項建構主義的數學計畫，但沒想到這個計畫一提出之後，很快地被全美的數學家及教育家公開反駁，認為這樣學生會無法做好往後上大學的準備。於是二〇〇〇

年四月中，美國數學教師國家委員會即發表了學習數學的原則及標準，內容提到恢復使用機械式的方法去計算乘法，也就是必須背誦九九乘法表。換句話說，美國已經發現建構主義在教學上的缺點並加以改進。

【周祝瑛，2003年，175頁】

如果我們在1997年稍微忍耐一下，不要急著把別人還在實驗階段的課程拿來使用，不要急著提供自己的孩子充當白老鼠，三年後，等美國數學教師國家委員會的報告出爐，知道了實施建構式數學的問題的嚴重性，這一場建構式數學的風波，就會完全消彌於無形了；或者如果我們實在忍不住，非要自己的孩子當一下白老鼠，可是當到二〇〇〇年，看到了美國數學教育家的報告之後，就該（遵奉曾志朗當年所下的三道行政命令）立刻喊停，那麼孩子們走的冤枉路，就只有三年而不是六年，後三年還可以作一些補救工作。所以，鑑往知來，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才是正確推行教改的不二法門。以下筆者就個人心得，提出一些關於台灣教改的探討，期能拋磚引玉、立雪程門。

要蒔花除草，還是要連根拔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盧建榮博士去年發表一本討論教改的書，取名叫『從根爛起』，言下之意，似乎台灣的教育問題已經爛到根部，如果這樣說不幸言中的話，那麼台灣教改的問題是不是要連根拔起、另起爐灶？換句話說，是不是要從結構上加以改造，大刀闊斧地翻修一遍？還是說，保守一點，能修就修，能補救補，盡量不要動到基本的建築結構，以免棟折樑倒、屋垮椽崩，反而得不償失。此處藉兩位英、美學者的研究，提供參考反思。

英國學者Fullan M. 在討論到教改努力為

何會失敗時，提出了兩個基本理由：

1. 教育問題是非常複雜而又難以駕馭的，很難想出可行的、強而有力的解決方法，更難的是付諸實施。
2. 現今所採取的策略都沒有把焦點放在能有作為的事務上，無法指出根本的、指導性的改革以及連帶的教育學者間發展新的合作文化的問題。

【Fullan M., 1993, p. 46】

他以1992年美國學者Wehlage等人所進行的計畫『新希望創舉』為例，觀察他們為了幫助問題青少年，在都市學校裡所作長期的結構性改革行動，針對Wehlage在結論中自稱，「絕大部分的干預行動都沒有帶來根本的變革，反而只能說是補充性的變革」，Fullan提出了兩點明確的教訓：

1. 要完成根本的變革沒那麼容易，即使有著豐厚的資源及來自各界重要夥伴的允諾，或者僅只專攻少數幾個學校。
2. 最難敲破的核層，乃是學習核層，也就是改變老師的教導行為，改變教學文化，朝向建立師生、家長、行政人員等更大的合作關係。

【Fullan M., 1993, p. 49】

美國學者Cuban L. (1990) 也指出，改革的型態至少可分兩種，即第一層次的改革和第二層次的改革，舉例說，美國太空總署在檢討兩次發射火箭失敗和七位太空人喪生等事件時提出，到底挑戰者號意外事件，是設計的問題？是品管的誤差？還是兩者皆有？Cuban L. (1990) 認為精確定義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會左右變革的方向。他說，解決品管問題是表層的變革，而改變設計則是深層的變革。

放到學校裡來，則表層的變革包括聘任更好的老師、行政人員，提高薪資，公平分配資

源，挑選更好的教科書，添加（或刪除）各學科內容及作業，更有效率地規劃行事曆，以及引進新的評量版本與培訓辦法等。表層變革只設法使現有的機制更有效率、更具功能，不去攪動根本的組織特性，不去實質地改變大人與小孩扮演角色的方式。深層的變革則是設法要改變組織的基本結構，引進新的目標、新的架構、及新的角色，例如推行開放教室、教育券計畫、老師治校、或由社區當局決定預算及課程等。

Cuban L. (1990) 發人深省地說，從進入二十世紀以來，成功的學校改革一般都是表層的變革，偶而有人用不對等的方式嘗試特殊的深層的改革，例如推行以學生為中心的指導教學、學校不分年級、協同教學、及開放空間的建築等，但幾乎都沒有持續的功效，除非個別的老師或校長，在某個小地區，選擇性的去適應這些變革。

台灣的教改，無論是民間的版本或官方的版本，似乎都設定在深層的改革，例如以人為本的教育觀、能力教學、合科協同教學、高中職社區化、廢除高職、教授治校等。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可行，實際上，當觸及到最難敲破的核層，自然就踢到鐵板了。

要自由交易，還是要公平正義

近代歐美的教育理論中，一直存在著新自由主義學派的市場化理論，和社會民主學派的政府管控理論，兩方面拉鋸論戰的狀況。市場化理論認為，教育不是公共利益，可以作為商品在市場上自由買賣，這樣不僅家長與學生有更多的選擇，而且經由市場競爭，自然淘汰，讓家長與學生可以挑到價廉物美的學校就讀，學校的經營與管理品質也會有所改善與保障；政府管控理論則認為，教育是公共利益，不能任其在市場上自由買賣，應由政府介入，提供

免費的公立學校，或有補助的私立學校，免得優秀的窮學生，讀不起又貴又好的明星學校，這才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

教育是不是公共利益至今還在熱烈討論中，但是把教育放進自由市場，家長與學生則未必真能有合乎理想的選擇，例如，爛學校就未必會被市場淘汰掉，這在台灣是特別明顯，通常當某學校爆發醜聞，或瀕臨倒閉，教育部為了息事寧人，都會主動介入，或甚至接管，該校也就繼續經營下去了。景文技術學院就是一個標準的例子，自從2000年七月發生財務危機以來，其第五屆董事會遭教育部撤銷及接管，並獲教育部資源注入，當校務逐漸步入正軌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卻於2003年九月一審作出撤銷教育部原處分的決定，換句話說，如果最後該判決確定，原董事會將有權要回經營權。教育部手邊還有五件與此類似的案件在纏訟中。

其次，家長在選擇學校時，地緣關係是首要考慮，如果住家附近，只有一所爛學校，或者附近幾所學校都爛，家長根本就毫無選擇，爛學校自然淘汰不掉；筆者在英國上課時，也聽到一則趣事，即該教授在做研究時，發現一所好的貴族學校，竟然暗地資助鄰近另一所窮人子弟的爛學校，原因是深怕該校倒掉，造成『難民潮』湧入貴族學校，降低他們的品質。

再者，家長也很少具有專業知識，以及即時而又充分的訊息，可做為選擇學校的判斷依據，通常都是人云亦云，遽下決定，等發現問題時，孩子的傷害卻已經造成了；還有一點就是，在學校強勢廣告、形象塑造的包裝之下，家長看得眼花撩亂，也常會有錯誤的判斷。

至於自由市場的操作，可以使價廉物美、品質保證，這一點在台灣也是令人懷疑的。首先，開放民間廣設大學之後，公私立大學的學費都迅速飆漲到天價，而開放民間編印教科書

之後，課本加上參考書的價格也一路往上飆，而且還有被壟斷之虞，何來價格低廉之有？品質保證呢？教改先驅黃武雄教授在『教改怎麼辦』一文中即說，近年由升格或改制而設立的私立技術學院與大學，品質不良者為數眾多；周祝瑛教授也提到教科書編寫倉卒，錯誤百出的情境，尤其令人堪虞的是，編輯委員球員兼裁判、書商非法行銷、教科書研發不成熟等問題，反而使得品質無法保證。（153-155頁）

由政府管控教育，就會有便宜的公立學校供給來自各階層的學生就讀嗎？在台灣就不見得。台灣大學經濟系駱明慶教授在其論文『誰是台大學生？』中，提出數據說，從一九八二年到二〇〇〇年，百分之八十二台大學生，來自二十個明星高中，這數字顯示，如果國中畢業，沒有考進這二十所高中，則將來只能與全國其他的高中畢業生，去爭奪剩下的百分之十八的台大入學名額了；同一數據又指出，台大學生一半來自大台北地區，而台北市學生比率最高，約為台東縣的十五倍，大安區更是勇冠全市；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薛承泰在其『十年教改為誰築夢？』一書中，對他自己的學生所作調查亦顯示，父親學歷在高中以上者佔八成，大學以上的佔一半，而一般五十歲男性平均受教育時間約八年，只有國二的程度；（p.81）這裡不僅看得出貧富懸殊，還看得出城鄉差距。

還有一樁趣聞，就是今年台大清寒學生申請助學代款，竟然無一人合格，換言之，依教育部的標準，他們的家長都不算清寒，可是看看各私立大學的助學代款申請合格的人數，就會發現，便宜的公立大學，有較多富家子弟在讀，昂貴的私立大學，反而是較多窮人子弟在讀。這是很明顯的階級複製，所以，政府管控未必會主持公平與正義。

政府管控教育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

執政當局的意識型態會左右教育機構的人事、行政、和課程，也就是教育行政無法回歸教育本質。這在台灣，凡是經驗過戒嚴時期反共抗俄教育的人，一定還記憶猶存、心有餘悸的。現在解嚴了，也政黨輪替了，是否就沒有意識型態了？從李登輝總統到陳水扁總統，一系列去中國化課程的安排，在在都是意識型態作祟，例如母語教學、改編台灣歷史課本等等。如果母語教學能做到加惠於台灣的原住民，那麼現在台灣的外籍新娘人數已逐漸接近原住民的總人數，請問他們子女的母語教學在哪裡？如果二二八事件被定性為外省人軍隊屠殺本省老百姓，那麼當時被本省暴民打死的外省人豈不死得冤哉枉也？現在已經有小學生在學校因為台語表現不佳，而受到老師歧視的現象了，這與戒嚴時期許多學生在學校因為講台語，而被處罰在胸前掛牌子，有什麼兩樣？如果教改是從意識形態的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那教改的意義何在？

既然市場機制和政府管控，都無法提供公平正義的教育，那麼解答也許是在兩者之間，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最佳的平衡點，就成了教改學者們最大的挑戰。英國教育學者Lawton D. 在『一九九〇年代的教育與政治』一書中，討論如何邁向共識時說：

既然自由市場是無法被排除的，那麼一個有控制、小心規範的市場，在公私立學校相輔相成之下，有可能提供一個基礎，以達成有適當共識的政策。（p.106）

要「師」直為壯，還是要「師」老兵疲

Fullan M. (1993) 還提到另外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就是老師心力交瘁 (burnout) 的問題，他說：

這情形（指教改失敗）的後果關係到會持續傷害教學的操守，有大量的證據顯

示，有操守的好老師不是變得憤世嫉俗，就是變得心力交瘁。……目前教育的高能見度就像一把利劍的雙刃，一面高度期待校外社會及在舞台中心的老師與行政人員能好好扮演角色，率先產生了不起的熱誠和擔當，一面在沒有後續實踐的理念與能量之下，懷此高度期待，反而成了老師心力交瘁的最佳食譜。所有這些對心力交瘁的看法，都有一個共同的認定，即心力交瘁是由「不被重視」的感覺所引發的。(p.54)

另一位美國教育學者Farber B. (1991) 在討論老師心力交瘁的發展過程時，有一段精彩的摘要如下：

(1) 熱誠與奉獻精神逐漸退場，(2) 從而產生挫折與憤怒，以回應個人的、工作關係的、社會的許多壓力來源，(3) 不被重視的感覺，再導致(4) 不肯擔當，然後導致(5) 擴大自己的要害，出現許多身體上(頭痛、高血壓等等)、認知上(『要怪他們!』；『我需要照顧我自己!』)、以及情緒上(易怒、悲傷)的症狀，如果不治療，(6) 就會一直惡化，直到產生虛空與不在乎的感覺。(p. 35)

這種現象在台灣也不遑多讓，在一本由全國各地十幾位基層老師，透過網路架設平台，進行文章交流，集體創作的『教改野火集』一書中，郭明智老師曾描述了一段小學老師專訪時說：

對於曾經是自己的最愛，十年之後，卻變成一個想愛也不知從何愛起，甚至興起想要逃避的念頭，終究因為不敢面對外面瞬息萬變的工作環境，只得無奈地回到這個事實上已經僵化了他的思考模式的鬼地方，郭插志的內心其實是相當痛心的。他也曾經自暴自棄的想過，這輩子大概就是這樣了，每天站在街頭與橫衝直闖的汽

機車搏命；或是拿著碼錶，緊張兮兮地趕在上課鐘響完六十秒內，神乎其技地改完三十五本作業；或是疲勞過度，甚至在校務會議時，大刺刺地埋頭呼呼大睡起來。

【太史簡，2003，208頁】

讀完這段，我們清楚地看到郭明智老師內心的虛空與不在乎，也就是Fullan M. 所說的心力交瘁。再看看近年來學校教師的退休潮，周祝瑛教授在前面所提的新書中指出：

學校的教學功能逐漸喪失，教改花招層出不窮，教師們在疲於奔命之餘，一方面痛心職業尊嚴喪失殆盡，一方面又擔心政府財政日益艱難，勢必要縮減公教人員福利，於是紛紛辦理退休。目前台灣各縣市都湧現了前所未有的退休潮，2002年全台灣教師退休人數已經達到創紀錄的九千人，是一九九七年的兩倍之多。(p.258)

不要忘了，「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其實也是用腳在投票啊！李遠哲院長說，教改失敗有三個原因：行政措施失當、家長觀念未能跟上、老師不夠努力。第一個原因不正是在說，他所推薦或認可的行政當局，無法實施他所領導規劃的『教改總諮議報告書』嗎？第二個原因說了等於白說，因為家長觀念要跟上談何容易，就算觀念跟上，真正面臨要實踐時，又談何容易？例如士大夫觀念，人人皆曰不好，但是又有幾個家長，不以自己的孩子讀到博士為榮？第三個原因，就是錯怪了老師，以前舊體制下的基層老師，原本也是滿腹辛酸的，大部分都期待英明領導者，來推動教改，要不然哪來那麼多人參加年1994年的四一〇教改運動？李遠哲院長又何以能被推上教改舞台的龍頭位子？曾幾何時，老師卻成了被改革的對象？現在弄到心力交瘁，他們乾脆一不做二不休，退休總可以吧！

筆者認為應該反向思考，既然改革老師是

那麼不應當及不可能的任務，不如邀他們一起來共襄盛舉。教改人士不是說，希望孩子們快樂學習成長嗎？為何不能在推動教改時，也讓老師們一樣快樂學習成長呢？這裡就可看出，教改計劃要有基層老師參與的重要性。

該閉門造車，還是該開誠相與

有兩個管理的詞彙是Fullan M. 特別提醒我們小心的，他說：

集團思想 (groupthink) 和巴爾幹化 (balkanization) 是過度同心協力的應有惡果。集團思想就是在進行團體決策時，沒有批判就接受，或者壓制不同意見。……同心協力並不代表要全體意見一致，也不代表要禁止重要的異議。……巴爾幹化現象則是發生在，當團體內部形成強烈的忠誠度時，導致了漠視、或甚至敵視其他的團體，尤其是在大型學校裡，當次文化發展到會禁制校內其他創見時。……變革文化至少在三個方面會產生問題，第一、校內忠誠度可能太強烈，而干擾了成員對外在社會的職責；第二、變革文化反而成了集團思想和巴爾幹化相互孕育的溫床；第三、即使極度成功的革新，也無法肯定會持續下去，因為在不斷變化的複雜情境中，事物是會改變的。

【Fullan M., 1993, p.82-83】

台灣的「教育改革推動委員會」，將師範體系背景的成員排除在外，便形成了集團思想和巴爾幹化等現象，關於這一點周祝瑛教授也提到：

最初教改會的組織曾遭人批評，包括：組成委員背景同質性太高，缺乏教育專業及基層教師代表；角色模糊，未能專注研議教改的工作，而轉為下鄉舉辦座談等枝節工作；只完成擬議及審議國內重

要教育議題；缺乏其他具體的規畫等。
(p.32)

教改會兩年中，一方面由於教改會成員同質性太高，也就是他們的專長及留學國家同質性高；二方面缺乏基層的教育工作者，包括師範體系的教育學者、學科專家的參與，較難彌補現有委員對台灣本土教育生態及社會脈絡了解不足的情形，因此，在整個過程中，教改會的代表性以及整個研究的視野都有所欠缺。其中，李院長在教改會成立之初曾說過：我們都是見過世面的人，只要資訊足夠，我們就可以做出正確的判斷。(p.89-90)

Fullan M. (1993) 可沒有像李遠哲院長這麼樂觀，他認為，一個人，在某一段時間裡，不可以碰巧進入了某個團體，就單單只依賴那個團體。一個有守有為的教育家，必須隨時準備建立及改造跨越其事業的人際關係，因為那才是未來的現實，亦即不斷的變革，有時變得更好，有時變得更糟。他針對集團思想所提出的解藥就是，在團體狀況最佳之時，改變團體的代理機制，採取四項策略以避免謬誤的共識：

- (1) 保持開明的氣氛；
- (2) 避免團體孤立；
- (3) 派員擔任批判的角色；
- (4) 避免氣使頭指。(p.83)

台中縣北勢國小老師林榮梓，在『教改野火集』中，介紹太史簡這個作者時說：

總是由上而下的課程改革，從不問基層有什麼問題，教育改革就是一種政治正確嗎？……

我們是最基層的教師，對這波教改我們有兩個主軸，

第一種：平等的專業對話！

第二種：讓教師想出自己的教學之路！……

Eisner (1994) 所提醒的：許多教育改革就如大海一般，表面上是波濤洶湧，不過我們一旦走進教室裡，卻又發現海底裡仍是一昔如往、風平浪靜，對於許多教師是沒有影響的。……但是這個波濤洶湧，卻只是教改花一堆錢，調訓一堆人，印製一堆印刷品、光碟片、幾個教授全省走透透，表面上熱熱鬧鬧，一堆表格（讓教師時間都耗在這裡），沒有基層教師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是空的。

這就是台灣教改缺乏基層參與、缺乏異議加入的寫照及結果。

六、結論

教育改革是千頭萬緒、治絲益棼的工作，是全民運動的工作，沒有人是無所不知的專家，也沒有人是一無所知門外漢，從教育行政人員，到老師，到家長，到學生，無人能管窺全貌，也無人能置身事外，必須集思廣益、擴大參與，若還要想要達到公平正義，不讓少數既得利益階級私相自肥，獨享厚利，則一切都要攤在陽光下，所以教改是民主運動，而不是民粹運動。黃武雄教授之所以反覆強調，要發展公共論壇，開設教改實驗營，用意便是如此；二次教改運動之所以呼籲，要設立專門性的國家教育研究院，想必用意也是如此。◎

參考書目

- 01 Berends, M. (1992) 'A description of restructuring in nationally nominated school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an Francisco: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 02 Cave, P. (2001) 'Educational reform in Japan in the 1990s: "individuality" and other uncertainty'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ume 37 No.2, p.172-191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03 Cuban, L. (1990) 'A fundamental puzzle of school reform.' In A Lieberman (ed) School as Collaborative. London: Falmer.
- 04 Doyon, P. 'A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n modern Japan', Higher Education 41: 443-470, Netherlands: 2001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05 Farber, B. (1991) Crisis in Educ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06 Fullan, M. (1993) Change Forces: Probing the Depths of Educational Reform. London: Falmer Press
- 07 Lawdon, D. 'Problems of choice: the market and educational planning' Education and Politics in the 1990s. London: Falmer Press
- 08 Shimizu, K. (2001) 'The pendulum of reform: educational change in Japan from the 1990s onwards' Journal of Education Change 2: 193-205, Netherlands: 2001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09 《教改野火集》太史簡 著（2003）／領行文化出版社（台北）
- 10 《誰捉弄了台灣教改？》周祝瑛 著（2003）／心理出版社（台北）
- 11 《教改怎麼辦？》黃武雄 著（2003）／教育研究月刊106（台北）
- 12 《誰是台大學生？》駱明慶 著（2002）／經濟論文叢刊30輯1期（台北）
- 13 《十年教改為誰築夢？》薛承泰 著（2003）／心理出版社（台北）

「我要向RCA討公道！」

訪RCA自救會會長梁克萍女士

訪問 ■ 杜繼平 / 整理 ■ 林育群

美國著名的跨國公司RCA自1969~1992年在台灣設廠二十餘年間，成為台灣電子業的巨頭，多年被評為出口績優廠商，在台灣賺走數十億美元的利潤。然而，RCA在生產過程中卻對台灣勞工與土地造成深重的傷害。一千多位職工罹患癌症，不治死亡者目前已達三百餘人，日後死亡數字還將持續增加，而三氯乙烯、四氯乙烯等有機溶劑對土地污染的面積則廣及數公里，深達地下五十公尺，危害之烈，為台灣所僅見。但對此巨禍，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政權都予漠視，非但令受害的RCA員工求償無門，還縱放跨國公司輕易轉移在台資產，逃脫賠償之責，至飽受殘害的RCA員工于哀哀無告之境，徹底暴露了台灣政權的買辦本質。置RCA在台灣的這段罪惡史，活生生、血淋淋地呈現了跨國公司對經濟不發達地區的工人與土地的殘酷剝削與榨取，也真實地反映由出口導向造成的所謂「台灣經濟奇蹟」正是以眾多勞工的生命、血汗為磚瓦堆累起來的。為了喚起社會重視RCA受害職工的痛史，積極予以支援，也為了留下台灣經濟發展中這段血淚斑斑的可貴經驗，本刊將陸續刊出一系列RCA職工的訪談紀錄。 ■ □ 編者

當「克難」的孩子踏上
RCA的紅地毯

■請先談談你的出身背景

□我出生在嘉義的一個小眷村「克難新村」，眷村的生活都是很艱苦的，我爸爸是一個上尉，生活並不好過。我有兩個哥哥，一個小妹。一到要開學，爸爸的眉頭就皺在一起，因為不爭氣，讀私立學校，註冊費很貴。所以我民國58年高商畢業以後，就想出去工作，但嘉義當時沒什麼工廠，找不到事做，正好我的一個鄰居，他姊姊就在RCA上班。



RCA自救會會長梁克萍女士

■當時你們家庭收入的唯一來源就是你爸爸的薪水嗎？
□我母親沒有工作。每到寒暑假，我們都會幫媽媽做家庭代工。我們那邊有兩種代工，一種是做火柴盒，還有一種就是炮竹，串火藥的炮心。我一直在想，國民黨對不起我們，民進黨也對不起我們。國民黨執政這麼多年，沒有關心過軍人，沒有去照顧他們的家庭、子女，住的房子比貧民區還要貧民區，可憐喔，真的是矮小，從前面到後面加起來12坪，12坪要住全家人，你說要怎

麼住？民進黨說國民黨執政不好，上台以後又對我們好嗎？都是一樣的。像鄧小平講的一句話：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我覺得會照顧我們的就是好政府。軍人實在太苦了，我從小過的是那種苦日子，所以當我跨到RCA的時候，就被廠房吸引住了，我覺得那個廠房很漂亮，整個是紅磚弄起來的，漆著乳白色，很歐式的一個大廠房。在眷村裡住的地是爛泥巴，什麼也沒有，要有洗澡間、流理台，那是不可能的，在眷村裡面哪看得到，就像我住的那個新村的房子：克難，什麼都是克難。那RCA真是很漂亮，進到人事部裡面看到地毯、冷氣，那種氣派，覺得真是好好的一個工作環境。

■RCA那時候有要求比較高的學歷嗎？

□他們那時候要求的學歷都比較高，要高中畢業，你高中畢業進去只是做裝配員喔，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分配在一廠的線上，我插過零件，然後做焊錫的工作。在線上待了半年多，就到物料部去了。我管過高壓線圈HVT線，是做包影像管，用鐵心繞銅絲，然後去充磁，上面絕緣線上還要塗一層瀝青，聽說那個也是劇毒的。在那個地方做，你會沒有嗅覺，因為它裡面的東西都有很強烈的惡臭。那個弄好了以後，放在一個架子上，一格一格放上去，推到裡面一個密封式大房間的烤箱去烤乾。那個時候我們實在一點都不知厲害，裝鐵心的盒子用完以後空下來時，還帶一些地瓜去裝在盒子裡送到烤箱去烤來吃。

■你們的工資待遇跟一般台灣中小型的工廠

相比較怎樣？

□我民國62年進去時的工資，好像是3千多塊吧，跟公務員薪水差不多。當然那時候RCA的待遇實在講是比較高，福利又好，但每天上班時間很長，蠻長的。從上午7：50到下午5：30，早上10點鐘休息10分鐘，中午吃飯時間只有半個小時，很趕。工廠把工時從這裡壓縮出來，所以我們那時才能隔週雙休，分大禮拜跟小禮拜。

RCA以女工為主，階級分明

■在勞動過程中的組織管理的體制，大概是怎麼樣？

□RCA的組織在裝配員之上，有副領班，再上面是領班，一個領班管二、三十位，一條線有兩三百位。領班上面是副組長、組長，再上面是主任，主任上去有經理，我們有分一級經理、二級經理、三級經理，一級管二級，二級管三級，三級就管主任，RCA你要怕的人很多，所以RCA的人那時候講，做官的可能比做事的人還多，他工分的太細了。

■在RCA尤其是裝配線上的性別來說，是不是女工為主，有男工嗎？

□一條線裡面，可能才兩三個男工，99%以上都是剛從學校畢業的女工。台灣人很棒的地方就是學得快，東西做得讓RCA很滿意，工資又低廉，所以美國的國內廠就縮編了，拿給台灣做，台灣廠就一直增擴，但勞工人數有限，第一梯徵的時候，可以要求很高，到第二梯補徵工人時，標準就要降低，這時候年齡放寬了，可能就有三十多歲的，

到第三梯的時候，三十多歲也招不到人，四十出頭它也要了。

■你們公司整個升遷獎懲的方式大概是什麼情況？你們在裝配線上肯定是最不好受的，這樣的分級管理，類似官僚體系，層級嚴密層層節制，像這樣的監管制度，剛開始不適應，久了之後就接受了，習慣了？

□是無奈的接受，有的人是靠身體去換取升遷的機會；這種事情在RCA多的是，譬如說跟經理有一腿，就能找到喜歡的位置，大部分都發生在中方經理身上。因為中方經理上班的時間是和我們一樣的。美方經理會輪調，而且他們在更上一層，我們看不到，他們跟我們之間有隔閡，連用的東西全都與我們隔開。

■包括他們的用水、吃飯等等？

□對，RCA有給經理用餐的VIP餐廳，餐廳裡有漂亮的窗簾、柔和的音樂、厚地毯，有高級的廚師弄給他們吃。我們像共產黨一樣是吃大鍋飯的，一張餐票就是打三個菜呀，拿一個餐盤，一桶飯隨你吃，喝湯也是隨你。一般裝配員，第一，不敢進西餐廳，第二，吃西餐的話，一張餐票還要貼十塊錢，當時十塊錢還蠻大的，坐一次計程車才五塊錢，誰捨得去吃西餐？

■所以RCA內部是階級分明？

□RCA內部是蠻黑暗的，階級非常分明。經理的權力很大，我經理常跟我講：會做事的人不見得是我要的人，人有兩種，一種會做事的，一種是聽話的，我要的是聽話的

人。我就是不聽話的那種人，會做事，可是不會聽話，他講的話會反駁他，所以每次在加薪的時候，人家可以加到10%，我可能只加到5%、6%，我可能是太過於忠直，不懂得逢迎拍馬，我是在軍人家庭裡長大的，軍人本來就是一板一眼的，所以沒有學到那一招。像我的主管有一次就問我有沒有錢借給他，我說沒有，我現在才知道，別人為什麼加薪加的比較多，因為別人都有借錢給他嘛，我這個人太不會做人了。我主管常講一些話提醒、暗示我：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RCA很黑暗的地方就是這樣，你會逢迎拍馬，就會升官，不會逢迎拍馬，就永遠都在那裡。

RCA線上作業員都變成機器手

■你們工作空間上的配置，譬如說生產線上的位置間隔是多少，整個工作場所有沒有擁擠感？空氣流通的狀況怎樣？

□RCA生產線很擁擠。一條線排兩三百個人，幾乎就是肩膀捱肩膀，坐的位置前面就插著料桶，寬度不大。到後期的時候就比較寬鬆，工程師也精簡了，為什麼？譬如做19吋電視這條線，剛開線的時候，要三百個人，做半年以後就減到兩百八十個人，因為人熟練了以後，動作就快了，本來插十個零件，再多放兩個給你，就變成插12個零件，動作越來越熟練，分給你插的零件也就越來越多，變成像機械手一樣，就像現在有些人打電腦可以不用看鍵盤，到最後可以精簡掉三分之一的人。

■員工流動性大不大？

□不大。線上的裝配員開線後就要坐定位。離位或去洗手間都要請候補或者領班來代班，配合線上的機器來走，為什麼這個狀況之下，流動率還很少？可能是那個時候的福利吧。第一，有優厚的休假日，第二，它有八棟宿舍，宿舍裡面，給你發衛生紙，床單都是白色的，弄得很乾淨，衛浴設備都是粉紅色，蠻歐式的。到了假日的時候還開party，RCA有育樂中心，平常給你學習的空間很多，開什麼縫紉班，英文班，生日的時候那些大經理還會搞一些活動，所以電子廠的女……，其實我很不喜歡稱呼她們女工，我覺得是蠻那個……，有些工運人士常說：你們這些女工如何如何，有一次就被我們台下這些比較有知識的女工說：請你不要稱呼我們女工，可以嗎？因此還爭執起來。

■你剛提到公司有辦活動，我看公視的報導還說到公司也辦內部刊物，就是讓員工發表文章嗎？還是發表建議？

□文章比較少，大部分都是建議，我們的刊物是季刊，寫工廠內務的事。廠務部的經理就曾在刊物上提議要挖更深的井，讓水質更好一點。我們控訴RCA挖井，造成污染，就是從刊物上抓出證據，所以他抵賴不掉。RCA在民國75-76年的時候，叫我們寫建議案提升品質。職工工作做久了，就知道怎麼改進效率，怎麼節省物料。很多QC就會提案，有的工程部也會提案，促進節約，像是管物料的，我就提油槍的問題。我們裝有機溶劑的油桶都是50加侖的密閉式大油桶，要把它抽打到五加侖密閉式的紅色鐵桶，抽到溢出來以後，才知道滿了，很浪費溶劑。

RCA廠房是建在農田中央，溢出來的油都流到外面的稻田，這就是污染的原因。所以那個時候農人常常會到RCA來抗爭說秧都死掉了。我看過加油站的油槍，加滿油以後會彈跳起來，便提議清潔劑要用油槍來加，我畫了一個投影片表示，溢出來的都是錢：money、money、money這樣掉下來。廠方聽我的建議便買了油槍，溶劑就不再溢出來了。建議被採納後，廠方也會從節省的金額中抽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給你，並在廠內刊物表揚。

十幾種的化學物質 全都在一個空間裡面揮發！

■你前面提到，在勞動過程當中會碰到有毒的物質，你那時有沒有感到不對勁？

□沒有，只是感到很累，每天回家第一件事，一定是躺在椅子上休息一下，然後再起來做晚飯。回家就覺得整個人很累，那就是吸到那種有毒的物質。這也是我們到美國拜訪矽谷毒物聯盟的泰德先生才知道的，他太太在美國是職業病的律師，他解釋給我們聽，單單是三氯乙烯，可能致癌率不會那麼高，可要是十幾種的化學物質全都在一個空間裡面揮發，吸進去的是十幾種濃縮的，百分之百會致癌。只要用到焊錫，焊錫裡面有一種松香，燃燒以後會黏，要用三氯乙烯、四氯乙烯的清潔劑來洗。

■在焊錫的過程也會有煙霧，裡面應該也是有有毒的物質？

□有呀。新人到RCA工作現場，會覺得整個霧濛濛一片，好像霧裡看花，很嗆、刺

鼻，一進去就受不了，如果受得了三天他就能待下來了。外國人常說：台灣人怎麼那麼厲害呀，汽車跟摩托車排出來的廢氣，他們一來就喉嚨很痛，可是你們都沒事耶，你們的適應力很強耶。

RCA勞工拼經濟，換病痛

■發現你的同事紛紛罹患癌症，甚至有人死亡，大概是什麼時候？

□民國83年我在媒體上發現有人跟趙少康檢舉，RCA那塊土地污染，我就打電話給同事，聊起RCA土地污染的事，才知道許多同事得了癌症。我就打電話到飛碟電台問趙少康說：RCA的土地與水污染跟員工得癌症會不會有關連？後來趙少康就把我們的案子轉給環境影響評估文教基金會的秘書長劉銘龍，他叫我安排一些得癌症的患者，到勞委會去拜訪主委詹火生。然後又約了一些衛生局的官員，在台大校友會開了一場記者會，很多癌症的死亡者家屬、患者出來控訴，事情就是這樣揭發的，那時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所長王教授，就講這絕對是會致癌的，絕對有關連。

■得到癌症的這些人，他們也不曉得原因是什麼？

□不知道，我們是媒體報導出來之後，才連貫起來的。以前我們把RCA的三氯乙烯、四氯乙烯當成美國仙丹，很好用，像他們線上的工作服裝，打點有機溶劑，連用水清洗都沒有喔，往椅背上一晾，一下子揮發掉了，就乾乾淨淨的，再穿上去。桌面上髒了，倒一點，就擦乾淨了，還帶回家去洗油

煙機，洗廚房咧。跟你說無知嘛。我對政府不滿，它太虧欠我們了，就像杜老師說的，台灣經濟奇蹟的背後是什麼，就是這些生病的人的血跟淚、生命堆積而成的，一車一車的貨櫃怎麼出去的，也是這些人的命堆出來的，那你今天政府做了什麼？他們老了不能動了，政府怎麼照顧他們？置之不理！

組自救會，要跟美國人討個公道！

■你當時怎麼想到要組織同事成立自救會？

□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我的個性是屬於雞婆型的，看到不滿的地方我會站出來，碰到這麼多同仁生病，尤其是我最要好的一個同事，叫卓淑芳。她是育達商職畢業的，長得很漂亮。我看著她結婚、生子，隔了很多年都沒有聯絡，我再接觸到她的情況時，真的是心在滴血。她在我們工廠的時候就生了一男一女，離開以後又生了一個女兒，四個月大就發現有垂直性感染的肝癌，才半歲就開始接受化療，治療到三歲半死了，前後動過三次手術。她先生懷疑這麼小的孩子為什麼會得肝癌，就建議她檢查，一檢查出來發現是乳癌第三期，她拖了三年也不治身亡，死時還不到四十歲。那時候沒有健保、勞保，全部都要自費，雪上加霜，整個家庭都給拖垮了，真是淒慘。我覺得美國人賺了我們的錢，屁股拍拍就跑掉了，留下這些爛攤子要我們這些可憐的勞工承受，太不應該了，我要討公道，就決定組織自救會。

■現在死亡總人數有多少？

□三四百應該有吧。像我去年去美國爭取國際奧援，回來時就有三個已等不住，都走

了。我常去探視病患。有個叫楊燕春的同事，我第一次去馬偕探視她，看來還可以。去年11月7號我再去看她，精神已經開始恍惚，講話有一點語無倫次。11月26日再去看她，護士就拿了一張死亡證明給我看。說真的，我做RCA的會長，做得心裡很難過。

現場不重建，如何鑑定職災？

■你們在索賠的過程裡面，對政府與司法的處理上感受是怎麼樣？

□不要說是司法，光是勞委會勞工安全研究所所做的研究，就不客觀不公正。我們去拜訪當時的勞委會主委詹火生，詹主委說沒有問題，只要鑑定出你們是職業上造成的傷害，我們一定都算，兩年以內都賠給你們。問題是職業病鑑定要重建現場，可是RCA的工作現場根本重建不出來嘛，你現場重建不出來，怎麼知道一天八小時是在什麼惡劣的狀況之下工作？你連想都想像不出那種狀況，怎麼去鑑定？勞委會從民國88年開始總共做了三次鑑定研究。第一次做出來發現RCA裡面罹患肝癌、乳癌、子宮頸癌的比例很高。第二次的報告就說，肝癌與子宮頸癌的罹患率並沒有太異常，只是乳癌的稍微偏高一點，第三次就把重心放在乳癌的上面，結果認為也沒有偏高，只不過發現RCA的女性比一般的婦女停經來得早，一般婦女五十多歲停經，RCA的婦女45歲就停經了。我認為這些報告根本不客觀，他們研究時沒有問到一個問題，就是RCA的線上作業員流產率很高，而且有死胎。像我自己的子宮還不到25歲就切除了，我是前置胎盤引起的大血崩，有沒有相關，我不知道。

後來我聽艾琳達說，三氯乙烯、四氯乙烯會使女性賀爾蒙不平衡，造成流產、死胎，可是這些在流行病學報告當中都沒有放進去。

■所以到現在為止，都不能認定這算是職業災害？

□不能。那時候跟我們一起去抗爭的礦工，現在都已經認定是職業災害，不過那些老礦工也不懂，錢大部分都給黃牛代領掉了。有些媒體以為新聞報導後，RCA的問題就解決了，可是RCA到現在就是還沒有解決啊？真是無奈呀，五百多萬能在國內打什麼官司？

RCA資產五鬼搬運，政府幫大忙！

■原來RCA在台灣還有20幾億資金，你們也針對這個做標的，想要去假扣押，為什麼一直不能夠實現？

□我對政府非常非常失望，對司法也非常非常失望。88年的時候我就找桃園的立委陳根德跟經濟部要求不能讓RCA的資產脫產，經濟部也回文說他們一定會慎重處理，在職業病未鑑定之前，責任未釐清之前，絕對不會讓RCA脫產。86年，桃園的立委賴來琨委員帶我們到監察院，請監察院彈劾失職人員。因為RCA從62年、64年到81年總共違反公共安全法規八次，政府並沒有勒令停工，也沒有罰一毛錢，而且還評定為績優廠，年年績優呀，這中間是不是有問題呀？公安違規，檢驗出來，說是三氯乙烯、四氯乙烯量太高，裡面空氣污濁呀，沒做到安全呀，裡面都寫得很清楚呀，政府卻沒有罰款或勒令他停工，要他改善，都沒有。好，監

察院給我回函說政府確實失職，造成勞工生病，到最後呢，你看，我們執行假扣押的時候，只扣了五百多萬，我請問你，這個錢怎麼五鬼搬運出去的？87年就搬運出去了，從律師給我的一疊相關資料裡面，我就發現，實在是很慘，你知道嗎？RCA付了兩張支票給陳長文的「理律」法律事務所，陳長文是代表RCA。今年6月7號晚上跟律師開會的時候，才知道，所有的錢都轉出去了。就看著他一直轉呀轉出去，轉到現在只剩下五百多萬，這是誰的錯？中華民國的政府連這麼大的錢轉出去，都不會去看一下、去控制一下，這個經濟部是怎麼做的？

認清RCA的真面目： 輸入污染，糟蹋勞工

■請你談一下對RCA的認識過程。

□我對RCA的認識也是這幾年慢慢累積下來，剛開始我不知道RCA在印第安那州造成污染，也是屁股拍拍就走掉了，本來我也不知道RCA會無恥到規避發給我們退休金。勞工退休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在同一個事業單位做滿25年，可以申請退休，另外一種是年齡到了55歲或是60歲，也可以申請退休。我們的指望是在同一個事業單位做25年，我做了18年半，只不過還差了6、7年，就可以申請退休，在RCA就可以領個兩三百萬，至少我還能規劃退休的生涯。可是RCA用資遣的方式，我只領了56萬，我做了18年半，56萬，請你幫我算算看，我一年分多少錢？我要怎麼去安排我的後半輩子？而且當我離職的時候，我是38歲，我到台灣的任何一家廠，卻找不到工作，他說，我不

要你，你是來領退休金的。我快40歲的人，找不到工作，沒有辦法，台灣的廠是非常現實的。RCA規避勞工退休金用的是一貫的伎倆，在每一州要結束RCA的時候，就會請一個高手來逼你，整治你，讓你待不下去，你如果還能熬得下去，他再慢慢跟你談。就像日本廠Sony一樣可惡，Sony在台灣設廠二三十年，我聽到它關廠的方式我覺得真是太過份了。它把裝配員的椅子拿掉，現場的作業員全部都站著插零件，站八小時你受得了嗎？中間休息十分鐘的時候，第一，你要衝去哪裡？衝去上廁所嘛，第二，喝一點水，等你做完這兩件事，哪有時間坐？馬上又得站著工作。這樣子能忍受下來，就能拿資遣費，忍受不了，就自動離職。RCA用的手法比較高明一點，他請了一個談判高手來，先收買工會，所以我們就很平順地關廠，美國專門研究RCA的學者也很訝異別的地方都還有抗爭，為什麼台灣沒有？這就是RCA可惡的地方。再說，它蓄意犯罪，所謂蓄意，它明知道在美國國內是污染的東西，還搬到台灣來，為什麼不改善？還用這種方式再污染，這在企業上就是蓄意行為犯，蓄意殺人，這是很重的罪耶。

■他意識到你們這些屆臨退休的員工已經一大批了，所以就馬上資遣，要把台灣這邊的廠結束掉？

□那個時候RCA講說要轉移到大陸去投資，實際上只是把已經不要的老機器搬到大陸去，它只是做些動作矇騙台灣經濟部的投審會。所以我就覺得政府對勞工實在實在太虧欠了，沒有用心在勞工的身上，沒有好好

地照顧勞工。

■你說RCA因為污染的緣故在美國待不下去，所以才到台灣來，台灣還舉雙臂歡迎？

□對嘛，張臂歡迎，這麼大的一個大廠到台灣來投資，台灣政府還給他保稅、免稅，進口任何東西是免稅的耶，五年一簽，你看它多高興呀，而且，最有利的一個條件是，當時美金對台幣的匯率是一比四十，一塊錢美金拿到台灣當四十塊台幣用，多好用呀？其實三氯乙烯、四氯乙烯很貴，一桶清潔劑等於我三個月的薪水，一萬多塊錢，非常的貴。有沒有聽過我們台灣的聲寶廠、大同廠有污染？因為他們把它當成仙丹、仙露呀，回收再提煉、再用，他們不會隨意倒掉，很貴的東西嘛，他捨不得倒啊，怎麼能把金子倒在地上呢？黃金耶，那真的應該叫做黃金，可是美國人他不在乎呀，一美元換四十台幣，很好用，勞工又低廉，隨你們怎麼用，怎麼糟蹋都沒關係。而他們又以大老爺心態到台灣來，你想想看，民國50幾年，外國人到台灣來，我們中國人都縮在一邊耶，在路上看到外國人，你還要讓他呢，他老大，這樣是不是叫自卑？是民族的自卑吧！

資方買通閹雞工會，賣斷工人血汗青春

■你剛才提到RCA收買工會，隨便就把你們資遣了，問題出在勞工的意識不夠強，加上工會組織的不健全，所以你們的權益完全沒有保障。如果有一個比較健全的工會，你工廠裡面的管理規章制度，都是可以去談判的，但是過去因為整個政府就是威權體制，延伸到包括整個經濟部門，整個工廠也是一

個小型的王朝一樣，整個都是由上而下，一條鞭式的。

□你剛剛這樣講是對的，我們工會的頭頭是執政黨裡面軍人退休下來的，他把那一套又帶過來。我們工會代表就說，想要私底下談一些事情的時候，都要跑到很遠的地方躲起來談，不能讓他知道。我們工會裡面大的頭頭，都是一級的經理，工會全部都操控在他們手上，那個工會形同虛設。RCA要關門的時候，只要買通工會幹部就好。資遣費都是工會頭頭跟資方私下談好決定的，勞工根本沒有辦法參與，工會把我們整個賣掉。

■你們工會從代表到理事，沒有經過普選嗎？不是用投票的方式產生的嗎？

□要怎麼普選？工作線上發單子給你投，主管叫你寫張三，你敢寫李四嗎？寫完他都會看呀，你寫李四的話你就有得受了。我知道工會裡面的黑暗，沒有辦法，關廠時我們拿什麼去跟人家談判，我們就像一塊肉放在砧板上，任人家去剝，只要收買工會那就好了，收買工會只需要花多少錢？像我的情況，56萬就把你18年的青春買掉了。

■RCA是否有過什麼勞資爭議？你個人曾對其管理的方式表達不滿，但有沒有比較集體式的？

□沒有，就是沒有，真的，所以我常說，RCA的員工真的很柔順，RCA關掉以後，有些人到了外面之後才發現：哇！我們以前在RCA真是井底之蛙，真是可憐之中的可憐。他們離開RCA轉到別的工廠以後才發現，人生都在RCA虛度了。◎

文化廣場

召喚苦難民衆的 靈魂 (上)

自本世紀始，鍾喬在「民眾劇場」的基礎上，引入日本帳篷劇的表現形式，連續三年創作了《記憶的月台》（2000）、《海上旅館》（2001）與《霧中迷宮》三個劇本，由差事劇場演出，在台灣展現了戲劇表演的特殊風格。

鍾喬的魔幻帳篷劇

■林于立

一、鍾喬與「帳篷劇」

1980年代，鍾喬擔任『人間』雜誌的編輯。在戒嚴的年代裡，『人間』雜誌以犀利的文章，大膽凝視的照片，揭露當時人們所不願正視、也不敢正視的社會陰暗角落。在那裡，

發現了長期來受盡苦楚，卻始終被歷史忽略的，無名姓的「民眾」。在這條延長線上，鍾喬於90年開始「民眾劇場」的活動。對鍾喬而言，劇場不是用來慰藉中產階級因為工作而疲憊的身心，也不是為了排解都市人空虛的寂寞，而是為了捕捉從來未曾在歷史舞台上登場亮相的「民眾」瞬間的身影，企圖讓被文化帝國主義壓抑的第三世界人民，或稱之為「沉默的文化」的「民眾」發出聲音來。

1995年，鍾喬在菲律賓的民答那峨島認識了日本帳篷戲劇「野戰之月」的劇作家兼導演櫻井大造。日本戰後六十、七十年代的小劇場普遍地左傾激進，其中櫻井大造的戲劇更是激進中的激進派。從「野戰之月」的前身劇團「曲馬館」以及劇團「風之旅團」開始，櫻井大造就選擇了背負著帳篷巡迴日本各個大小鄉鎮的這種方式，作為他戲劇表現的手段。他的作品對日本天皇制度以及成為其共犯結構的日本社會發展露骨的批判。鍾喬與櫻井大造兩人在政治思想、戲劇觀點與舞台美學上有許多共鳴，但也有歧異之處。兩人在酒力的催化下，以支離片斷的英文相談甚歡，並且展開此後台灣「差事劇場」與日本「野戰之月」之間的深度交流。

雙方每次的偶遇都為各自往後的戲劇方向起了決定性的影響。例如櫻井大造受到對魯迅情有獨鍾的鍾喬的觸發，因而以魯迅筆下的阿Q作為腳色原型，創造了《阿Q之陣》、《阿Q基因密碼》等一系列的戲劇作品。而透過櫻井大造，鍾喬將帳篷劇這種劇場空間的可能性與思維方式帶進他的「民眾劇場」當中。櫻井大造曾幾度來台，而鍾喬也數次訪日，近距離接觸了櫻井大造帳篷劇的製作過程以及實際的作品。就這樣實現了「野戰之月」首次來台公演。1999年夏天，「野戰之月」的團員們搭起原本將用來舉辦婚喪喜慶的本地帳篷，在三重重新橋下的二重疏洪道河堤旁演出《出核害記》。這是自1992年唐十郎在台北林森公園搭起紅帳篷演出《檳榔的封印》以來，帳篷劇在台灣的第二度演出。翌年，鍾喬的第一號帳篷劇作品《記憶的月台》由櫻井大造與鍾喬聯合執導，在華山的空地上演出。這次演出，無論對於台灣觀眾或者「差事劇場」的演員而言，無疑都是個未曾有的劇場經驗。2001年鍾喬又在「差事劇場」的地下室裡演出《海上旅館》。這個作品雖然標明為「詩劇」，但是，從將地下室劇場的地板堆滿著泥土和水等的舞臺景觀，以及演員的表演方法等方面看來，其實我們不難發現帳篷劇特有的空間形式和邏輯已經滲入了差事劇團的表現靈魂中了。2002年五月，鍾喬再度推出第二號帳篷劇作品《霧中迷宮》。從此，「帳篷劇」與「社區劇場」的工作坊成為差事劇場的「兩隻飛翔的翅膀」。

劇本，雖然是以語言為形式的藝術，但是不同於詩歌、小說等其他文學，劇本的語言並不是戲劇藝術最終的型態，而只是等待著被演員表演、被在時空當中再度發生的「可能態」而已。因此，劇本的語言都在其內部蘊含著某種「身體」與「空間」的可能性，同時，劇本的語言也都被這種「身體」與「空間」的可能

性所制約著。很顯然，鍾喬的這幾個作品是為了帳篷這種空間以及帳篷劇的表演形式而寫的，因此，要了解其作品，首先我們要知道所謂「帳篷劇」，它的特徵是什麼，它的表演形式與空間的可能性為何，如何制約劇本的語言形式，以及它所形成的歷史與社會的過程為何等等。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的是，「差事劇團」的帳篷劇雖然與日本的帳篷劇有所關聯，卻也有所區別，它是奠基在「民眾劇場」的延長線上，產生于台灣特殊的文脈上的東西。

二、「帳篷劇」是什麼？

「帳篷劇」顧名思義是在臨時的場所所搭建的帳篷當中所演出的劇場形式。從60年代起，日本掀起了一陣小劇場運動的風潮。阻止日本政府與美國繼續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所引發的「安保鬥爭」是這一代小劇場運動者們的共同體驗。以「反美」和「反體制」作為精神後盾的小劇場運動，以「顛覆」和「破壞」作為劇場藝術的美學尺度。他們除了對於既有戲劇作品裡頭的「意義」或「形式」等部分提出質疑之外，更對於以往戲劇的「文化地位」、「組織方式」、「演出場地」等屬於「戲劇制度」的層面高唱異議，企圖從根本否定既成戲劇所賴以成立的一切。以這樣湧動不安的精神和否定的美學作為背景，加上受到美國Living Theatre和「偶發藝術」的刺激，日本戰後的小劇場運動爭相在公園、野外、市街、咖啡店排練教室等非劇場的表演空間裡頭演出。而第一個以帳篷作為表演場所的是「狀況劇場」（後來的「紅帳篷」）的唐十郎。

「狀況劇場」

「狀況劇場」成立於1962年。最初除了在小劇場演出唐十郎自創劇本之外，「狀況劇場」

也在公園的水池等地點演出類似「偶發藝術」的野外劇。1967年，「狀況劇場」首次以搭蓋的帳篷演出「月笛阿仙：義理人情初級篇」。這次的演出堪稱是一個「社會事件」，這個事件除了標出「帳篷劇」的本質之外，同時也形成了帳篷劇表演形式的「傳統」。

60年代的東京街頭充滿著「安保鬥爭」的騷亂不安，尤其是新宿街頭是嘻皮、無政府主義者、次文化年輕人、虛無主義藝術家等份子的蟄集之地，更時常成為街頭抗爭衝突的舞台。整個新宿瀰漫著一觸即發的緊張氣氛。1967年「狀況劇場」計劃在新宿花園神社的庭園裡頭演出「月笛阿仙：義理人情初級篇」時，雖然屢次提出申請，但仍不為新宿警方所批准，於是「狀況劇場」決定強行演出。演出當天，武裝的鎮暴警察將帳篷四周團團圍住，由於帳篷劇場的外壁只是一張薄薄的帆布，鎮暴警察一邊將警棍揮向坐在最邊緣的觀眾，一邊不斷以擴音器阻撓演出。觀眾的哀嚎聲、警察的咒罵聲、演員表演聲、警車的笛鳴聲此起彼落，發生在劇場內的「戲劇」與劇場外的「戲劇」交織輝映。就在這樣劍拔弩張的氣氛下，「狀況劇場」的演員更不甘示弱，用盡能量，幾乎是以嘶吼的方式唸完台詞。此後，這種演員能量全開的表演方式成為了帳篷劇的表演傳統。就像是這次演出所象徵的，以薄薄一層帆布隔開劇場的內部與外部，這種「現實」與「虛構」不斷地相互滲透攪亂，更形成了以後帳篷劇的最基本劇場美學特色。

「黑帳篷」劇場

繼唐十郎的「狀況劇場」之後，另一個開始以帳篷作為劇場型態的是以佐藤信為領導中心的「黑帳篷」劇場。「黑帳篷」的前身是「自由劇場」、「六月劇場」與「發現之會」。這三個團體為了地方巡迴演出之便而成立了營

運單位「演劇中心68」。但是翌年，在「發現之會」退出同盟組織後，原本為了營運目的而成立的「演劇中心68」便改組成為以推動戲劇運動為目的的組織「演劇中心68/69」。這個企圖心旺盛的組織底下共分五個部門，分別是「據點劇場」、「移動劇場」、「壁面劇場」、「教育」以及「出版」。它們不甘只將戲劇安住在與世隔絕的劇場中。而是企圖要將戲劇由一個單純的作品內的世界拓展成全面性的社會改革運動。其中的「移動劇場」就是以帳篷劇的方式巡迴演出日本各地。1970年「黑帳篷」劇場以四個月時間餐風露宿，忍受寒暑，巡迴了日本五十個市鎮演出「燃翼天使的舞蹈」。這是一齣描述選擇了暴力革命的馬拉與鼓吹情色革命的薩德之間故事的作品。對「黑帳篷」而言，帳篷劇代表著一種戲劇的社會革命，一種浪漫、天真理想主義的民眾意識的改革運動。

經歷過「安保鬥爭」與「大學紛爭」的小劇場運動者們稱呼「帳篷」為「帶著走的拒馬」。在70年代，鎮暴警察將原本被學生運動佔領的大學校園一一攻陷，將用課桌椅堆砌而成的拒馬一一拆毀，當社會逐漸回歸到「正常」的生活時，這群小劇場運動者將革命的理想化做漂流的旅程，在自我放逐當中找尋浪漫的依歸。在此時，帶有濃厚自我流亡意味的帳篷劇象徵著挫敗的理想以及孤獨者的浪漫。

帳篷劇的特色

「帳篷劇」是個戰後新興的劇種。它所以被視為一個「劇種」，不單只因為它是在帳篷裡頭演的，而是因為它擁有形成一個「藝術範疇」所不可或缺的「帳篷劇美學」。這個「帳篷劇美學」規定了劇本的結構與文體、演員的表演方式、劇場空間的使用等所有帳篷劇的表現要素。關於帳篷劇，我們可以描繪出下列的幾項特徵。



「霧中迷宮」是差事劇團第二號帳篷劇作品。

「非日常性」對於日常的侵犯

首先，帳篷劇最明顯的特徵式在其空間形式上。帳篷劇不是常設的劇場機構，而是像馬戲團一般突然出現而後又隨即消失。對於定居於都市觀眾而言，帳篷劇的邏輯是吉普賽式的游牧思考，這種思考是以非日常性對於日常的侵犯。

帳篷劇對於搭建帳篷場地的選擇有某種傾向。帳篷劇總是選擇河邊，廢棄工廠外的荒地或者位於都會角落的神社等地。這些場所的共同處，就在於他們都是屬於都市的邊陲，從權

力中心所宰制的空間當中往外部溢出的過度地帶。而這種對於空間的選擇，事實上反映出帳篷劇對於自身發言的位置與姿態。「紅帳篷」的唐十郎稱帳篷劇的演員為「河原者」。所謂「河原者」是指住在河邊的人。在日本以前住在河邊的人都是一些從事清污工作或妓院等需要使用到水源工作的「賤民」。而這些「河原者」同時也是歌舞伎等日本傳統藝能的發始人。他們所身處的邊緣位置提供他們與位於權力主流不同的觀點，而這種觀點正是藝術想像力的無窮泉源。日本戰後的小劇場運動者從傳

統藝能當中，從「民眾」豐沛的創造力當中得到觸發，將左派的「批判性」觀點與「河原者」的空間的精神結合，藉著「帳篷」的形式，在空間的政治學上將自己放在一個永遠「激進」的位置。

「親密空間」

其次，帳篷劇的空間是個極度的「親密空間」，這種空間的特性決定了帳篷劇舞台與觀眾的關係性。在空間的物理條件上，帳篷劇場是極度狹小的空間。往往就在不到八平方公尺大小的方寸之地，要擠下兩三百人的觀眾。這種「收納技巧」也是帳篷劇的一絕。例如像「紅帳篷」，在入口處每個觀眾會拿到一只塑膠袋，要觀眾將自己的鞋子裝到塑膠袋裡頭，然後墊在屁股底下當座墊。工作人員很有效率地指揮觀眾擠了再擠，直到所有觀眾都進場。而表演區更是狹小，演員的了演幾乎逼近到第一排觀眾的頭上。舞台的進行當中，演員的口水向下雨一般不斷降在第一排觀眾的頭頂上。這種空間上的先天限制成了帳篷劇強烈的空間性格。帳篷劇的一個不成文的遊戲規則是「如何將最小空間做最不合理的最大使用」。無論是帳篷前方後方、觀眾頭頂上的天花板、甚至帳篷外的所有環境都是帳篷劇的表演區域。而這種在物理上的「狹小空間」對於劇場而言是個「親密空間」。所謂「親密空間」是指觀眾對於舞台上所發生的一切投注以最大的「合作意願」使得虛構的戲劇事件得以成立。

「身體性的」語言

另外，帳篷劇場的空間特徵是內部與外部的相互越界。就現實的條件而言，帳篷劇場無法做到現代劇場最基本的「全然的黑暗」與「全然的無聲」的狀態。從薄薄的一層帆布外面不斷湧入週遭的光亮與聲響。一方面由於演

員表演的細節，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之下無法被觀眾所注意到；加上演員必須與周遭的干擾對抗，因此帳篷劇的表演方式都是「能量全開型」。演員的能量只要稍微低落就會被整個環境所吞噬。帳篷劇的這空間／表演的特色也影響了劇本結構與語言結構。在以寫實主義為中心的現代戲劇裡，戲劇語言是以「日常性對話」為主要，這種「日常性對話」的語言大都是簡短、片段而不完整的。這種「日常性對話」的語言在戲劇上的成立是以現代劇場的可能性作為前提的。因為現代戲劇的戲劇性並非存在於「語言」本身，而在於「語言」背後的「情境」，也就是發出這些話語時角色所身處的狀況。語言只是退於這個「情境」的反映或者投射。在舞台上，「情境」大都不是表現在語言本身，而是出現在角色對於語言的反應，以及語言和語言之間沉默的時刻。而要能表現這種戲劇性也只有可以在製造出完全的黑暗與無聲的現代劇場才能實現。總括以上這幾點，相對於現代戲劇的語言，帳篷劇的語言形式有以下幾個特徵：首先，在帳篷劇裡，外在的干擾隨時可能中斷表演的狀況下，為了與其他噪音區隔開來，語言非得自我形成一個「符號體系」不可。換句話說，帳篷劇的語言形式不是「日常性對話」的語言，而是需仰賴高度程式化的「非日常性的語言」。再者，一般寫實主義戲劇的場合，「語言」被包含在於「情境」當中，而帳篷劇的「情境」卻存在於「語言」裡頭。帳篷劇的「戲劇性」並不在於語言的「情境」，而是在語言本身。因此，這種語言，與其說是「對話性」的，到不如說是「敘述性」的語言。帳篷劇的語言是以演員「能量全開」式的表演為前提，這種語言型態往往是在音節上適合於「吶喊」、在呼吸上適合於「運動」、在感情上適合於「哀嘆」的「身體性」的語言。 >> 待續



探訪墨西哥 ■ 吳音寧

查巴達民族解放軍



寨面叢林

序言：

二〇〇一年新年，我站在墨西哥東南方的Chiapas（契帕斯省）一個印地安村落La Realdad，等待持槍蒙面的游擊隊員走上「舞台」，宣讀革命宣言。在我身邊有來自西方國家幾個異議團體的成員、墨西哥的社運人士及大學生、還有當地以及遠嫁其他村落特地走五六個鐘頭回來參加慶典的印地安原住民。不同種族、不同穿著、不同文明狀態的人們肩挨著肩，等待著，等待著時間從我們身軀跨越而去。

天空飄下微雨，草地有些泥濘，說實在的，慶典的氣氛完全不如我預期想像的熱鬧壯觀，一眼便可以辨識的外來者——如我這般的政治觀光客，幾乎佔了人群大半。我盯著村落廣場，那座以木板及竹子搭建的涼亭，心底掠過一陣隱約的落差，喔，那就是「舞台」！

舞台上擺著一張木桌及一張椅子，兩邊柱子綁上不細看也許會忽略的綠葉紅花當作綴飾，三五盞昏黃燈泡，在山稜夜色的背景裡搖搖晃晃。稍微洋溢節慶氣息的，只有舞台前方用牛皮紙圍起的區塊，土黃色牛皮紙貼滿一張張La Realdad兒童的畫作，以紅色顏料為主，稚嫩的筆觸畫著房子、星星、人等圖案，每張圖的邊角或中央並寫上EZLN的字樣。

EZLN（Eje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on Nacional英譯為Zapat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後來我在舒詩偉譯著的《拉美地誌·魔幻行腳》書中讀到他將EZLN翻譯成「查巴達民族解放軍」。而我所在的村落La Realdad正是Zapatista（查巴達）所屬的一個支援村落（support base）！

這是新年的慶典。從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查巴達以「Today we say, enough！」（今天，我們說：夠了！）作為印地安原住民對墨西哥政府宣戰的發語詞，照例，每年都會在各支援村落舉行新年慶典，宣讀革命宣言。不過，我們顯然消息有誤，La Realdad看來並非查巴達在二〇〇一年所選擇的主要慶典地，因此場面不像之前聽聞的盛大，反而顯得「平凡而真實」。

站在約莫百餘人的人群裡，隔著一段距離，眺望舞台前方的圖畫，毫無排場地，四個游擊隊員走上簡陋的舞台。

他們之中有三個一身黑衣黑褲，一個上半身套了件藍色運動服，同樣都在頸項繫著紅色領巾，用滑雪面罩套住頭，只露出眼睛和嘴巴，當然也都帶槍，不過整體看來總覺得不像「革命軍」，倒像穿著軍裝的老實農夫。

游擊隊員走向舞台中央，站定位後，擎起槍作勢扳動一下槍膛，由其中一位走到木桌後，拿起放置在椅子上的擴音器，開始宣讀EZLN副總司令兼發言人Subcomandante Marcos所寫的新年宣言。

「這是革命的第七年……。」

帶領我來到此地的Estacion Libre（一個美國有色人種的運動組織）一位伙伴在我耳畔，幫我將游擊隊員的西班牙語翻譯成英語，我努力聽著，歪著頭突然發現，黑暗中閃著微光的舞台，不知何時跑上一隻小狗，當革命宣



查巴達學習之旅的團隊成員，在Oventic合影。吳音寧／攝

言被宣讀，狗狗在革命的舞台上，懶懶的走來走去……。

「這是革命的第七年……。」

至今，我仍然聽見迴盪在墨西哥東南山區的陌生語言，不悲情作態、不激情造勢，卻是深深地敲擊在我心版，縈繞著回音。

一、不再屬於印地安人的墨西哥市

深夜十二點，走出地鐵站，像是從幽暗狹長的地洞爬出來，哇一聲，看見墨西哥市的「憲政廣場」迎接我以美麗。廣場很大，教堂、總統府等周邊建築亮著一串串流蘇似的燈飾，襯托出氣氛像是俗麗的遊樂場。隨意在地面鋪了毯子便賣起東西來的攤販，一攤一攤，吸引著人群湊過頭去瞧個仔細。川流不息的，人的氣味、食物的氣味、歡樂的氣味在冬夜裡滿溢。

「好漂亮喔！」我不禁用中文脫口而出由衷的讚嘆，轉而以福佬話對身邊的表哥說，「甘那親像台灣……」。

也許緯度相仿，也許市集皆存在相通的本質，雖然墨西哥市的街道建築明顯和島嶼有異，行走其間的人種膚色、語言也都不同，但我的第一眼印象竟是覺得「很台灣」——時間往後退個十年左右的台灣！並且立即聯想起故鄉村鎮的夜市，一掃長途飛行的疲累，張望著，跟隨表哥、Zenon及來接應我們的Emmanuel，蹦蹦跳跳穿過廣場。

墨西哥之旅，完全出乎我預料之外呀！

二〇〇〇年中旬，我辭去報社工作，決定到美國走走。那時我感情遇到瓶頸，工作似乎也到了必須更換的時間點，一派「走著瞧」的態勢，什麼也沒計畫便搭上飛機。旅行過紐約、巴爾地摩、華盛頓DC，在波士頓暫住進表哥Tim在海邊租的小公寓。Tim的父親，也就是我的舅舅，大學畢業後前往美國深造，卻因為主張台灣獨立，被列入黑名單，二十多年無法返台。Tim和他的姊姊Rolla在美出生長大，承襲了父親對台灣土地的熱愛，積極投入台美第二代運動，也多方支援美國各異議團體。

由於Tim的職業是電腦工程師，在美國收入算是中上，他便常像父親一樣「奉獻」，捐款給防止家庭暴力的、爭取同性戀權益的、重塑美國亞裔尊嚴的……各種PGO（非營利組織）計畫，其中，也包括了為查巴達民族解放軍拍攝紀錄片。

那時，查巴達還沒跑進我的腦袋。住在波士頓無所事事，中午起床出外逛，傍晚六點Tim會從工作地走回來，推開門問，今晚要去哪裡呀？

我們最常做的事，便是乘著月色走過大街小巷，去附近的學校或社區活動中心參加非主流的小型藝文活動，聆聽黑人演詩、觀賞紀錄片、座談會，或者和Tim的朋友去PUB跳舞、看電影。Tim的朋友幾乎都是亞裔第二代，父母來自南韓、馬來西亞、泰國、中國大陸……，當然也有像Tim這樣的「台美人」。他們相互援奧、相濡以沫，組成一小團體，每個星期固定在一間社福機構的辦公室開會。

每次我都坐在會議桌邊角，聆聽他們陳述有色人種在美國的處境、左翼運動在波士頓要如何推行、可能遭遇什麼困境等等。通常會議結束，一行人步行到唐人街（China Town）吃台菜或越南菜，然後在回程時，我和Tim一定會再去買杯換算台幣約莫百來元、挺貴的珍珠奶茶喝。

唉，一小撮生活在美帝陰影下的年輕運動分子！

從會議桌、唐人街、PUB，一次次聚會

中，我逐漸認識Tim的朋友，Zenon是其中一位——一位暗中盤算著為革命犧牲，實際生活卻尚未找到妥適的可行的「犧牲」方式的二十一歲華裔青年。

Zenon的中文名字是原子能，他的父親來自中國大陸，相異於Tim用福佬話演說「為什麼台灣要獨立」之類的講題，Zenon用中文描述他十九歲「回」到家鄉大陸的所見所聞。

而我剛好很高興，在美國除了英文，還有福佬話及中文可並用。晃悠悠在波士頓過日子，睜眼閉眼個把月飛逝。有一天，Tim照例傍晚六點鐘回來，開門對我說，有個團體要去墨西哥展開查巴達的學習之旅，他說他想去。

Tim對我略做解釋查巴達的歷史，我一聽，馬上眼睛一亮。

「啊，我也要！」

好脾氣的Tim當場發揮身為表哥的氣魄，答應贊助我這個窮光蛋，並且指著客廳牆面一幅圖畫說：「那是查巴達，好幾年前，我就想去看。」我看著畫中墨綠深深的叢林，一個個蒙面、圍著紅領巾的印地安人在吃飯、洗衣、念書、操槍，還有一個人爬上樹梢，伸出手，似乎想摘月亮……，心中充滿疑惑，那裡，真像圖畫描繪的那樣嗎？當時的我完全無從想像，中南美洲游擊組織是什麼模樣？匆匆收拾行李，跟隨Tim、Zenon，在波士頓朋友羨慕的送行中搭上飛機，來到墨西哥市。

從機場搭地鐵穿過城市底部，在「縣政廣場」到站，走出來。

「好漂亮喔！」看見墨西哥市迎接我以最初、至今難忘的豔色，想起大約五百年前，西班牙人初遇墨西哥市……。

那時，來到中南美洲的白人，最主要的使命便是征服與掠奪。唯我獨尊的宗教觀及高傲的民族偏見，讓歐洲文明殘酷地、血腥地、毫不留情地一步步剷除印地安古文明的豐美。但縱使如此，據說西班牙人初次接觸到阿茲提克（Aztec）帝國首都鐵諾支第特蘭（Tenochtitlan）時，也

曾如我般驚呼出西班牙語的「好漂亮喔」，只是讚嘆之餘，惡念隨之而起，不久就將印地安人以石塊砌築的古城夷為平地，繼而在廢墟重建起今日的墨西哥城。

（被毀去的城，展現過何種風貌？）

一位隨軍隊乘船到中南美洲的歷史學家Diaz，在《西班牙的征服》一書中見證到：

「當我們沿著平坦筆直的堤壩大道走進湖中的墨西哥城時，我們各個都說這簡直像是阿馬迪斯傳奇中的仙境，因為城中高塔如林，水上房屋連片，一切都用石頭砌得非常精緻。我們的士兵甚至問別人：眼前所見是不是在作夢？……我確實不知如何描寫見到的美景，這是我們以前未聽說過或看見過的，甚至也是我們作夢未遇到的。」

——引自《叩問叢林——發現瑪雅文明》一書，朱龍華著

如今那美景果然也只能像夢像仙境，任人揣想了。我所見到的墨西哥城，已屬歐式建築風格；當然還是很漂亮，只是人類斷裂的歷史傷痕想是永遠也撫不平了。

來迎接我們的Emmanuel，是位有著波多黎各裔與白人混血的青年，高高瘦瘦地，下巴處留著短鬚，在我看來就像道道地地的純種白人，但Emmanuel可不這麼認為。

Emmanuel大學時念的是美國印地安人歷史，他幾番從美國北部前來墨西哥，也參加過Estacion Libre舉辦的查巴達學習之旅，此次再來主要是觀察墨西哥政黨輪替後的情形。

在Emmanuel帶領下，我們穿越廣場去吃東西。非常不可思議的，進入一家尋常的墨西哥餐館點菜時，我發現女侍拿來的菜單，竟有中文字樣，甚至連餐館門邊的裝飾也刻著中文字。問Emmanuel，Emmanuel說可能因為華裔人口在墨西哥擁有相當勢力吧；墨西哥市有唐人區呢。

吃著美味的墨西哥食物，香蕉、牛奶、捲

餅、豆子磨成的餡、菜蔬及洋蔥炒在一塊的雜燴，在喧鬧的餐廳完成了初體驗的第一餐後，Emmanuel帶我們重回廣場。市集散去的廣場，空蕩蕩殘留垃圾。街道黯淡著冷清，流浪漢、街頭少年及隱匿在黑暗裡進行非法交易的人們，徘徊聚集在巷口街燈下，路過時，那些臉孔流動的身影，嘲弄的對我們挑釁，呦——，呦。Emmanuel囑咐我跟緊些，別東張西望。來到廣場邊，Emmanuel為我們導覽一小塊被柵欄圍起的石塊，據說是阿茲提克帝國首都的遺址。落寞的石塊，死氣沈沈的一隅，像歷史掉落的指甲屑，無奈的被保存著。轉過頭，在暗夜的古蹟旁，我看見兩三個青年歪斜地癱坐在地。他們喃喃說著醉話，手臂且不時厭煩的向外揮動，推拉著彼此。呻吟、嘔吐，彷彿愈積在心底的苦悶已到了非吐不可的地步，那聲音悲涼地蕩向夜色深沈，一路尾隨我進入下場的小旅館。沒有出路呀！台北、紐約、波士頓，來到墨西哥市，城市繁華的暗處，皆踉蹌著無力的掙扎。

二、漫長的出發

隔天一早，Tim、Xenon、Emmanuel、以及昨晚在旅館等待我們的Fernando、Rosa各自整理背包，準備出發。

Fernando是個身形有點壯碩的光頭男，Rosa則是胖胖的女生。他們倆是好朋友，都是拉丁裔美國人，都住在紐約。會合後，此次前往查巴達學習之旅的成員大致算是到齊了。兩個華裔美國人，三個拉丁裔美國人，加上我這個只出過兩次國的台灣人。

學習之旅是由一個叫Estacion Libre的美國有色人種組織舉辦，旅程開始前，基於安全考量，Estacion Libre要求報名者寫一份簡單的自傳，傳給Estacion Libre審核。

記得我盤腿坐在Tim的公寓客廳，往電腦鍵盤打著鶯腳的英文，熬夜寫我為什麼要去認識查巴達……。

經過Tim說明，我對查巴達的了解仍十分薄

弱，隱約只知道自己即將前往深山叢林裡的革命基地，那裡，沒電，沒有床，還有蚊蟲會咬人，因此要備齊睡袋、吊床、手電筒、防蚊液、藥品及衛生紙。革命的氛圍，惹人遐想。寫自傳時，突然憶起高中那年冬天，家鄉廟會，在芭樂、燒酒螺、棉花糖、烤玉米、射飛鏢、丟水球、投環等攤販環繞中，意外地我發現有人在賣舊書。

大多是醫療、美容、影劇、勵志之類的書籍，我從中挑選了一本名為《世界名女人》的傳記書。

《世界名女人》？對十六七歲、從未離開過濁水溪畔的女孩而言，世界多麼遙遠，盛名多麼遙遠，遠在摩洛哥的王妃、遠在西德的總理夫人、遠在美國的總統卡特的母親……，在這本一九七九年翻譯出版的十五位傑出女性奮鬥事蹟裡，我探勘的眼，停佇在義大利女記者奧利安娜·法拉琪（Oriana Fallaci）身上——一位長髮女人，十六歲獨自飛往正在越戰的西貢採訪。在題為〈最美好的人生——冒險〉這篇採訪稿中，法拉琪為一個蹲坐在島嶼鄉間廁所看書的女孩，講述生與死、戰爭與女性解放、以及她與她那被暗殺的希臘反抗軍領袖之間的愛情。我仔細讀過一遍，隔不久又讀一遍，心嚮往之呀！（真希望以後也可以像她。）

不過時間倏忽，上大學後，歷經台灣九〇年代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我們關心的議題都在島嶼自身，甚少將觸角伸出島嶼，關注到同為第三世界國家的狀況，只一次各學運社團聯合舉辦了跨校際的「第三世界影展」，似乎，有那麼一點點觸及到中南美洲的邊，觸及到想像的邊——夜色中顛簸的卡車駛過山區泥石路，革命分子用攝影機，將路邊一家野店閃爍的燈光記錄下來……，還有什麼？還有什麼？模糊地、搖晃地影子嵌鑲在記憶的箱櫃底。當我寫著自傳，寫著自己為何想去認識查巴達時，突然想起，是呀，不預期地，我竟然獲得了一次機會，重啟十六七歲少女的夢想，前往一個中南美洲國家，認識當地的武裝革命組織；還是拿槍的呢。

「希望他們准許我去，」我對Tim說，並且暗中自我承諾，要將這趟旅程紀錄下來。

終於，彷彿跨越了我十六七歲的夢想來到二十九歲的年紀，因緣際會，我抵達了墨西哥。

在墨西哥市待一夜，隔天一早Emmanuel帶領我們搭車走山路，準備深入墨西哥東南的契帕斯省——一九九四年元旦清晨，查巴達民族解放軍就是從這裡發出震幅持久的槍響。

我們大包小包的行李，來到公車站。公車站擠滿了候車的人群、商販以及穿制服的員工，那雜亂，來自台灣的我很熟悉。Emmanuel去買票，我邊看顧行李邊抬頭看架設在候車室裡的小電視，電視畫面出現的明星多是白人。

上車後，Emmanuel對我說起剛剛原本沒位置，可是公車站的工作人員看我們是「美國人」，特意讓我們先上車。他覺得很矛盾，反美分子仍享用了身為美國人的利益。

巴士從下午兩點半啟程。

坐得滿滿的乘客，和電視畫面不同，大多是黝黑的臉孔。西元一五二一年前，尚未被命名為「墨西哥」的這塊土地原本是印地安人的故鄉，但時至今日印地安原住民大概只佔墨西哥人口的百分之七左右。且按照目前的死亡率，族群的處境更加岌岌可危！那或許是查巴達不得不發動武裝革命的原因之一吧，但我一反常態地，沒和身邊的Tim討論，因為Emmanuel事先告誡過，巴士上不可談論查巴達，以免洩漏行蹤，也別讓革命、革命等字眼輕易說溜嘴。

車窗外牧耕過正在休憩的黃土地，冬陽下，稻草紮成三角形，一堆一堆放置。高粱田旁，牛隻在吃草。不怎麼密集的平房，水泥屋、磚造屋，漆上綠色、粉紅色、藍色、橘黃色、灰色等牆面，衣服晾曬在竹竿上。巴士蜿蜒過山脈，陽光暖暖撫照，顛簸車程中我昏昏欲睡。

看見可口可樂的字樣，寫在村落牆壁。

看見簡陋的商家，在鐵皮屋內。

看見松樹林立。

睜開眼、閉上眼。

看見休耕中的田地。

看見村落。

看見加油站。

看見山岬旁三五人聚集，伸出手，圍住鐵桶在取暖，鐵桶內熊熊燃燒著火光，映襯著黃昏。

天色漸暗，漫起霧氣，黑夜不知不覺籠罩了大地。

巴士繼續前行。

睜開眼、閉上眼。

又過了一山。

又過了黑夜聚落中遠方的燈。

又過了黑夜山林，臉靠著窗戶往外瞧，滿天星星。

巴士在一個休息站停下來，乘客陸續下車，走進販賣部，點了些墨西哥食物吃，十幾分鐘後，又回到車內。

車廂內昏沈著安靜，我大概下午睡了，晚上睡不著，開始躁動不安。看過巴士播放的墨西哥電影，一個長髮、印地安裝扮的女孩，騎驢子東闖西闖，看過西班牙語發音的好萊塢電影。

夜深了，Zenon與Fernando 低聲聊起美國局勢及各自參與運動的經驗，熱情壓抑著穿過巴士拖曳出袖口及毛毯的沉默走道。

又過了一山。

又過了一個休息站。

廁所的氣味漸濃，我覺得自己快要按捺不住了，久坐的屁股幾乎要著火。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到？這個問題，其實一上車我就知道。那時下午兩點半，Emmanuel告訴我要坐十七個鐘頭的巴士才會抵達契帕斯省。十七個鐘頭？有沒有搞錯？我以為自己英文能力不佳，聽錯了七與十七的發音，又問了遍，是十七，不是七嗎？是的。Emmanuel點點頭。

天啊。到底什麼時候才會到？我焦躁地抱怨，老天難道不能撥快一下時間的鐘？

就這樣斷斷續續睡覺、上廁所，巴士來到隔天清晨七點多。「Welcome to Chiapas」的招牌豎立在素樸的巴士站前。氣候晴朗，山脈青

綠。到了，終於到了。卸下大包小包的行李後，我一時還有些恍惚，啊，Chiapas，我終於來到這裡！

三、為什麼是契帕斯省？

如同大多數殖民地共通的歷史經驗：資源最多的地方，往往成為最窮的所在。位於墨西哥東南山區契帕斯省，擁有墨西哥最豐富的天然資源，卻是墨西哥最貧窮的地區。這樣的困境，在EZLN副總司令兼發言人Subcomandante Marcos一篇名為〈Chiapas: The Southeast in the two Winds〉的文章裡清楚顯露。除了拿槍，更以筆當武器的Marcos，一字一句、一步一步帶領全世界深入契帕斯省探訪，他說：

……你將會看到一個大型的標示寫著「Welcome to Chiapas」。找到沒？

很好。假設你看到了。現在你正循著通往契帕斯省的三條路中的一條前進。這條路往南、沿著太平洋海岸、你將抵達這個國家陸地範圍的最東南邊角。但是國家的財富並沒有因此而留下來，也是因為這三條路。契帕斯省正從許多管道中失血：從石油及天然氣管線，從電線、鐵道、銀行帳戶，從貨車、卡車、船和飛機，從走私、縫隙、及森林小徑，這塊土地持續向帝國主義者進貢，石油、電、牛隻、錢、咖啡、香蕉、蜂蜜、玉米、菸草、可可、糖、鹽、高粱、芒果、羅望子、酪梨，契帕斯省的血液流失了，因為數以萬計的管線插入墨西哥東南方的咽喉。成千上萬噸的資源被送往墨西哥的港口、火車站、飛機及貨運中心，再從那裡被送到世界各地——美國、加拿大、荷蘭、德國、義大利、日本，但是都是為了同一個目的，餵飽帝國主義者。……

——節譯自〈Chiapas: The Southeast in the two Winds〉

透過Marcos翔實的導覽，我們注意到契帕斯省的「風景」，存在著軍事機場、監獄、以及隨處荷槍實彈的檢查哨。我們知道了墨西哥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咖啡產量來自契帕斯省，但是契帕斯省的原住民窮到無法餵飽小孩，有時候只能餵小孩喝咖啡。我們知道以美國為首的跨國資本從契帕斯省開採大量的石油、天然氣並發電，但是原住民家庭夜晚只能點蠟燭或煤油燈。我們知道原住民小孩，每一百個就有七十二個連小學一年級都沒讀完，而半數以上的學校，一所學校只有一位老師。Marcos說，如果你是契帕斯省偏僻村落中一所學校的唯一一位老師，那麼你必須走好幾天泥濘路才能到達學校，而且到了學校後，你還必須面對學生因為飢餓而感到虛弱、昏昏欲睡。甚至，根本不會有學生出現，因為原住民小孩必須去砍柴或做其他工作。我們知道了，我們哀傷地一步一步知道了，在美麗的旅遊導覽背後，在編織、民俗舞蹈、古蹟、制式的樣板圖案背後，真正的墨西哥，有著成千上萬的印地安原住民，正陷於貧病循環中，死亡率極高。

所以，為什麼革命？

為什麼革命發生在契帕斯省，這塊佔地75634平方公里，墨西哥第八大的省分？

一位查巴達游擊隊員說：「當我們死於飢餓，我們不能再承受更多！」

而我來到契帕斯省的San Cristobal，在Estacion Libre成員住處，聽到那晚剛從監獄被放出來的EZLN成員，誠摯而樸拙地對我說：「去看看，去看看你就會知道！」

四、徵兆早已顯露

離開巴士站後，搭乘計程車進入契帕斯省的San Cristobal。一九九四年新年，EZLN一舉攻陷了契帕斯省包括San Cristobal、Altamirano、Las Margaritas、Rancho Nuevo、Ocosingo等六個城鎮，其中尤以San Cristobal為主要市政中心。在〈戰爭日記〉中，一位墨西哥作家詳述那值得標記的一天，他

寫到：

……

「現在是一九九四年元旦的清晨八點五十七分，我的父親叫醒我，告訴我，EZLN已經發動戰爭。我起床，穿衣。我的妻子轉開收音機，地方電台已經變成Zapata電台。收音機傳出一位有著中美洲腔調的男聲，讀著〈對抗政府軍的宣言〉。小鎮仍然寧靜。我的父親說，游擊隊已經攻到我們街邊，『配戴一些很好的槍枝……』，同時，來自Lacandon叢林的宣言，持續從收音機傳出。我還沒完全醒呢。」

「九點十七分，我的妻子將浸過醋水的濕手帕，蒙住孩子的鼻，孩子們露出驚恐的眼睛。」

「傳說，EZLN邀請每個人去參加游擊隊，只要參加，就發給他們靴子、黑褲子、棕色外套、紅領巾及一把槍。」

「我聽到更多槍響……」

「十點十五分，收音機傳出指令，要EZLN的人必須尊重市民，而EZLN也將很快審判那些警察、軍隊以及接受外國訓練而背叛國家的人。」

「十點四十三分。四個喝醉酒的青年，走下街來，手中還拿著啤酒。一個年輕人將襯衫拉開，對著游擊隊員叫囂：『來啊，來殺我啊，你以為我會怕你呀，狗娘養的。』但游擊隊員漠視這些挑釁。我想，他們真的醉了，新年嘛。而空氣中瀰漫著一股奇特的緊張感。」

「當游擊隊員射擊，人們聚集到轉角，當射擊停止，人們出現，甚至有小孩跑出來撿彈匣。」

「下午三點四十一分，市政中心舉白旗投降。」

「五點三十三分。紅領巾綁上市政中心。四十個警察，手臂被綁到身後，沒穿上

衣，臉上盡是害怕。聽說有些屍體在水坑裡流著血……。」

「六點十分，天氣變冷了，夜晚已經降臨，燈光也亮起。六人一組的游擊隊在街角已經守衛了一個下午。城的各角落也都有這樣的游擊隊。」

「確切發生了什麼事？我們需要新聞，但電視台根本沒播。」

……

——節譯自Efrain Bartolome的〈War Diary〉

按時間順序，墨西哥作家將一整天從家裡二樓觀察到的戰爭隨景，記錄下來，描述出EZLN攻陷San Cristobal的幾個片段畫面，也道出戰爭期間的驚恐與謠傳；像是活生生進入慢動作播放的槍戰片裡。但是，時間經過，當我在二〇〇〇年年底抵達San Cristobal時，San Cristobal已是座觀光盛行的小鎮——雖然革命分子仍在深山躲藏，街上可是公開且隨意地販售著有關查巴達的商品呢。

車子穿過石板路，穿過市政中心（旗竿上綁的已不再是紅領巾），穿過高聳的大教堂（土黃色牆面被噴漆噴出兩大排黑色的西班牙字，我視出其中有個單字是Revolution），穿過一間一間相連的磚造及水泥房屋（有些屋頂以瓦片砌成，意外透露出些許中國風）。穿過旅館、飯店、商店街，電線桿上貼著海報。穿過革命之後的年復一年，來到二〇〇〇年，在這一年的七月二日，統治墨西哥長達七十一年執政黨PRI（the Institutionalized Revolution）首次在總統大選中敗選，由當過可口可樂公司拉美地區總裁的福克斯（Vincente Fox）當選新任總統，競選時福克斯曾誇下海口，要在十五分鐘內解決查巴達民族解放軍的問題；於是，政治局勢將有什麼新的變化嗎？

我努力探看San Cristobal這座小鎮，尋不著戰爭殘存的明顯氣息——革命，隱匿在角落，

從角落匯聚。

在一九九四年新年之前，墨西哥政府及全世界不也是大意地未曾察覺，印地安原住民已經從契帕斯省的Lacandon叢林踏出、走了三千五百多年的步伐。

在〈Seeds of Revolt〉(造反的種子)這篇文章中，一位美國觀光客回憶到他在一九九三年夏天來到San Cristobal小住。有天下午閒坐在廣場看書，幾位印地安青年過來和他聊天。他們問他，知道Article 27(註一)嗎？印地安青年說，Article 27法案的通過，已經嚴重損害印地安原住民的生活。之前土地不能買賣，現在私營化，印地安人可能會被地方財主或軍隊脅迫而賣出土地。印地安青年還告訴這位美國觀光客，聽說有個日本商人為了建築用的木材，買下契帕斯省高原的土地。在契帕斯省，外國人可以假借各種名堂，大肆開發山林，但是原住民不准以耕作為由砍掉任何一棵樹。印地安青年問這位學歷史的觀光客，知不知道墨西哥獨立之初的革命英雄薩帕塔(Emiliano Zapata)？其中一個青年甚至說，一個公開的反叛行動即將展開。

當時，觀光客笑了，心想，怎麼可能，看看四周吧，San Cristobal可是到處都有武裝的軍隊及警察在巡邏。

但是，等著瞧吧！

徵兆早已顯露，像河流湧出，表示水在山底已經潛藏地走了很久、很久。戰事也是如此。San Cristobal的牆壁早被噴上意有所指的標語，縮寫的西班牙語，只是沒有人真正重視或察覺那代表什麼。水源從Lacandon叢林緩緩地、緩緩地拓展再拓展，一下子，水湧了出來，致使許多人都措手不及，甚至連水本身也沒料到衝擊的力量將有多麼巨大。

洪水般，EZLN在一九九四年新年，一舉淹沒了契帕斯省的六個城鎮，不僅震驚墨西哥當

局、震驚世界，連EZLN的副總司令Marcos在其後接受採訪時都表示：

「其實，我們預備了第二批的領導者。因為我們評估第一批領導者，包括我在內，及團體裡的其他人，應該都會在戰役之初被殺。但是呢，什麼發生了？我們走出去，我們戰鬥，結果他們竟然沒有殺死我們。這是多麼大的驚喜呀，他們竟然沒有在元月的第一個星期就殺死我們。」

連Marcos都沒料到，印地安原住民持老舊的槍枝，竟足以逼得墨西哥政府投降，繼而在對峙十一天後，不得不放棄正面圍剿。查巴達退回叢林，墨西哥政府改以封鎖、盤查、抓人入獄、抹黑、出動民兵攻擊……等迂迴戰術持續進攻叢林裡的自治區——那些彼此串連、提供游擊隊員醫療食物補給的支援村落。微弱的戰爭狀態。這其間，EZLN不曾再射出子彈，倒是政府年年逮捕很多印地安人。但是壓迫之地孕育著反抗之力，艱困中查巴達年年茁壯。

「事情未發生前，你永遠不會知道。」當記者問Marcos，發動武裝革命前，是否預料到查巴達運動會如此成長，Marcos以一貫幽默的語調反問記者：「如果我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告訴你，明天，我們將發動一場戰爭，你會怎麼對我說？」

「你瘋了。」記者回答。

是呀，事情未發生前，誰也不知道會怎樣。

水湧出後，我們回溯深山處一路埋伏而下的水流，才發現，徵兆其實老早就顯露，只是當時誰也沒辦法具體拼湊出這些暗示；就像現在，我們也無從知曉，當查巴達逐年獲得更多支持與認同後，未來，將如何發展？水湧出後，又將以什麼形式繼續存在地面？ >> 待續

註一 ◆ Article 27墨西哥議會通過的耕地改革法案，一九九二年由總統Salinas提出。終止土地分配，放任土地自由買賣。

霜降

(一)

整理 ■ 藍博洲

顏世鴻的回憶錄

顏世鴻，台南人，原台大醫學院學生自治會主席，一九五〇年六月，因牽連所謂「學委案」被捕，處刑十二年。出獄後，插班台北醫學院，完成未完的學業；畢業後，長期任職台南平民醫院。一九八八年一月，驚聞某難友病逝，在「入目入心日日寒」的傷感下，決定趁著未「老昏癡呆」之前，把年輕時代的歲月寫下來。於是，從

同年七月三十日一直到第二年的三月三十日止，他寫完了回一從日據末期日本學生兵經驗到光復初期台大醫學院學生生涯的「春分」，白色恐怖時期被捕前後的遭遇與感受的「霜降」，以及從青島東路三號軍法處到新店軍監、綠島新生訓導處到小琉球勞動營的囚人生涯的「小滿」。其中，第一部「春分」已在《傳記文學》第461期（2000年10月）至466期（2001年3月）連載。

一、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日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日黃昏，我正在盤算如何度過這一個漫長的晚上。期末考只剩下五天，從六月二十五日星期日開始；我也不知道班代表如何交涉而決定這個日期。其實，考試對我並不是很重要的；本來，我在接到家裡匯錢來的就想走了。情形已經很明白了，不走的話，遲早要走和大家一樣的路（被捕），不過走了，要到哪裡去？連家也歸不得。那就賭這十天，把期末考考完再說。兩百元，給了大妹一百五十元；情況很複雜，讓她多帶一些好。但福利社的帳一還，自己也只剩四十元。伙食費已經繳到月底，三餐不用花錢，但一旦要逃，區區這一點錢，實在辦不了事。五天前，

石玉峰（註一）走的時候，他身邊還帶了賣世界美術全集及美樂達相機的三百元。得了，這湊錢的事考完了再說——一些醫書可以賣掉。窗邊的釘子上掛著中午朋友們帶來的兩串粽子，大概有二十個左右吧。本來我是很好玩的，近來卻一點胃口都沒有。中午，我不在宿舍，也不知道這些粽子是誰拿來的。在日程表上，今晚要看完婦科與產科。這是第二次復習。我準備考試，包括考前一天，一定看三次。我打開婦科的筆記，只有魏火曜先生的和精神科用英文；其他的，仍用德文和日文。翻不到幾頁，有人敲門，我愣了一下，進來的卻是K。K一進來，就說出去散散步吧。他是工學院的，難得到這裡來。我默默地穿了衣服，還穿上難得一穿的皮靴，就和K慢慢地走到新公園口。這時，K才開口：「這些日子，許多

註一 ◆ 台南人，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所載，在台大工學院就讀時加入「省工委會台大支部」；畢業後，在台南曾文農校任教；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被捕；一九五三年三月三日處死。

人被捕了，我也覺得自己很危險。」K是中學（註二）時代的老同學，被迫考了軍事學校，一九四四年赴日，所以大學慢了我一屆，其實他在各方面都是很傑出的。他的自危，不過是多讀了一些社會科學的書籍；我稍知道內情，K是和這件案子無關的。石玉峰在臨走前也談到K的事情。石玉峰也是中學以來的同事。

「他太傑出而且太聰明，那些人可能有些嫉妒，一直不去碰他，他是沒有關係的。」我在心中反芻著石玉峰臨走前所說的話。K實在是太亮了，因此，工學院的那些人對他都敬而遠之。

「你不會有事的，石玉峰就不同了，以後你慢慢會知道。你就把這些書燒掉，我包你沒有事。」

「你呢？」

「我如果到月底還沒事，大概也不會有事了。」

五月二十八日，我和自稱「老朱」（註三）的人，應在這個地點相會。「老朱」卻光著頭，坐在紅吉普上。我眼力二·〇，遠遠就看到，於是由欄門走進新公園。五月卅日，我知道葉盛吉（註四）在南部【屏東潮州瘧疾研究所】被捕了，那是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四點的事。剛好早上那邊有人到台北，提起這件事所以我知道自己是逃不了這一劫了。但我也不能向K說的這麼清楚，只好做個暗示性的回答。

K剛從日本回來的時候，帶了幾本河上肇（註五）的書，言行稍帶些社會主義色彩，甚

至讀了一些馬、恩的著作，不過仍保持全工學院最好的成績。另外，除了小提琴和讀書，K沒有其他嗜好，朋友也不同，這一點救了他。

現在被捕的，說透一點，可能都是蔡孝乾的人（註六）交出來的。當然也有以「知情不報」、「資匪」的名義而被捕的。我無意向K說的這麼清楚，如說了，反而害他惹上「知情不報」的尾巴。我安慰K，但我自己的心情卻反而沉重。三個星期了，還不來，有一點希望，可能「老朱」推說只知道下次聯絡的地點，而不知我的住所，而葉盛吉也沒有說出我任何處。不過班上老K那麼多，這一希望只是萬分之一的可能性。極可能在考試的當場被捕，我心上客觀的推論是如此。反正考一堂是一堂，了不起一死而已。絕對不能拖累任何人，連自己的家人在內。沒有我，家裡可以生活，如牽累了老爸，一家就慘了。如果葉盛吉沒有被捕，「自新」可以考慮；葉盛吉被捕了，這條路也斷了。我認為兩個人一塊「自新」，不會連累他人。雖只有二十二歲，卻不至於死硬地認為「自新」是可恥的。不過，情況不同了，如果我一個人去「自新」，說的話萬一拖累了葉盛吉，那不如等待命運的安排。

我和K兩個人坐在衡陽街口的冰果室，談了一些朋友的消息，也談了一些時局的變化。如黃浦江的登陸艇的集結，虹橋機場上的MIG（米格）15的出現。

「台灣海峽不算長，不過對中共的海軍來說是太長了一些，何況那些登陸艇速度更慢。」

註二 ◆ 日據台南市。

註三 ◆ 本名楊廷椅，日本明治學院畢業，地下黨的學委之一。

註四 ◆ 地下黨台大醫學院支部書記，顏世鴻的直接領導。

註五 ◆ 日本經濟學家，（一八七九～一九四六），出身士族家庭，著有《貧乏物語》（正、續）、《唯物史觀研究》、《經濟學大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等。

註六 ◆ 彰化人，舊台共，參加過中共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戰後回台，是「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主要領導人。

而且，我覺得，在戰略位置上，美國不會願意看到他在東方的防提缺去一個角，可能這一兩天就會有什麼很大的變化。」

K在日本讀的是軍事學校，而且有軍事方面獨特的看法。其實，我在心裡早已有同樣的想法。

早年，我讀過麥欽德的著作，對所謂「內新月地帶」的戰略位置，有我自己的認識。美國在圍繞蘇聯的近百個基地，擁有近千的B36和B52，可以進攻蘇聯腹地。一但台灣落入中共手中，雖然往大的地方看，沒有多大改變。但是在五角大廈的人們看來，這卻是一個失去完整的美觀。「美觀」，這是我自己的杜撰。太平洋戰爭時期，台灣在對美作戰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台南航空隊伸展到拉波，他們一定有深刻的印象。麥帥對台南航空隊使他的B17毀滅於克拉克機場，一定終身難忘。所以，在戰略觀念上，即使有原子彈的出現了，他們心中可能仍無法拭去這一份執著。我也預感到時局在這短短半個月中可能有激變，但是求不出一個肯定的答案。當然，目前最緊張的是三十八度線及美國官員不尋常的頻頻東來。【應該是西來，地球是圓。到極東，說東來也不算是錯。】

「可能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六月吧。」

「是。不過下一步棋子要如何下，很難呢！」

我們走出了冰果室，是K付錢，K比我有餘裕，而且也不會亂用錢。而我一向是有錢先付，沒有錢就不來那些客套了。如今，我一個錢都捨不得花。

我們又往館前路走。

「我可能會出事，不過你是不會的。萬一我出了事，你不要慌，有一件事拜託你。世局難說，有了動亂，拜託你照顧我妹妹平安地回到家裡。」

K似乎很意外，不過點點頭。

「就是這件事，我可以辦得到。你放心吧！」

兩個人默默地由館前路拐中山南路，一直走到醫學院門口，然後我停下來。

「就在這裡告別吧。我們是廿五號考到卅號，如果一切順利，我卅號就回南部。」停了一下，我又說：「最好，暫時我們不要一起回去。如果有人問你今天晚上的事情，你就說，我們談的內容是考完回家的事情。而且，你要說，我不打算直接回家，可能到花蓮去旅行，這樣好嗎？我去年夏天去過。蘇花公路很不錯，藍的天，藍的海，花蓮雖然地震多，景色很好。而且想走一趟以前日本農民的農村——吉野村。這些內容你可要記得，或許用的上，不過，你是不會有事的。人很複雜，或許是我多慮，不過先準備這些，對你我都會方便。」

K盯著我的眼睛，而後點點頭。

「我是患了瘟疫的人，說到這裡，你大概清楚了。你走吧，我得回去準備應付考試。」

K走回去的背影，好像很寂寞。我在那裡站了一會兒，一直看著K拐到信義路。然後，我才由法醫和病理解剖室的前面走到圖書館，看看周圍才回到樓上的房間。

我一直到十二點才把婦科的筆記看了一遍。然後，我又拿出產科的書。因為考試近了，大家都還在趕夜車。這時候才由圖書館回來的同房的老W，已經躺在床上要睡了。實際上，六月廿日就如此悄悄地過去了，我看看掛在窗邊的粽子，然後又勉強集中注意力，準備把產科看完了再睡。

二、深夜的敲門聲

人是會變的；有時候緩慢，有時候卻很激烈。當然，也有人是終生不變的。而且變的往往在年輕的時候。就我來說，小時後，除了反

日以外，談不上有什麼思想。只是自很小的時候，對貧窮的人就有很明顯的同情心。在廈門，唸日本人的旭瀛書院。（註七）當時，家還住在泉州，我寄居在廈門的五舅（張錫均，抗戰時在重慶國際問題研究會任事。）家中。五舅是眼科醫生，收入很不錯，時常給我很多的零用錢。有時候找不到零鈔，甚至給我拾元的；當時，雇用一個褓母，一個月只要三元。我不懂得花錢，只會買一些故事書。五舅嚴禁我買零食吃，那時候，廈門常有傳染病，這是對的。我只有八歲，對這一點，我已經會了解五舅的用心。有好電影，五舅會帶我去看，不准我一個人亂跑。表姊比我大一歲，五舅似乎對她不大關心，表姐是三舅（張邦傑，軍統特務，台灣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初，為執委之一。）的大女兒。《漁光曲》也是五舅帶我去看的。只要我身邊有錢，看到可憐的乞丐，往往一給就是一元，害得對方不敢要的情形也曾有過。

「七·七」之前，五舅一家去上海幫二舅（張錫棋，醫生，中共地下黨員，六〇年代以安徽省委之職逝世。）的忙，父親（顏興）由泉州來到廈門。父親比五舅小氣，一天只給我五鐮，以後是一分錢。不過我身邊還有五舅給的將近拾元的錢。不久，「七·七」發生了。八月廿三日，我們一家臨時決定回台灣。理由是我偷聽到的，三舅要父親回台灣工作。父親本來是要到上海法租界的，行李都寄放在鼓浪嶼。這匆忙的決定，使我們只能帶四件行李，當日的收入一百多元（因為台灣人是日本籍，父親的存款已經被凍結了），連弟弟的衣服也來不及換，就做上黃包車，趕到碼頭。八月廿三日，我記得是日本領事館通知撤僑的最後一

天。三千多噸的輪船，載上近千人，我們只能在甲板上佔「一席之地」。港外有兩艘日本的軍艦，是護航的。父親上了船，就被叫去問了將近一小時的話。我只有十歲，不過這方面是早熟的，我已經知道回台灣是一個苦難歲月的開始。父親雖生在台灣，長在台灣，卻沒有家。祖父祖母都被鴉片害了，父親九歲就被賣過。伯父廿歲就因肺癆逝世了。接著，祖父、祖母也因肺病死亡。台灣的親人，只有兩個被賣給人家當養女的姑母。父親也沒有「有錢的朋友」，而且他只有中國的醫生執照。

不過，我知道日子之難，倒不是因為這個，而是日本人已經對回台的動機起疑。母親的兄弟們，都是反日出了名的。父親比較喜歡收斂一點，這也是三就要他回台工作的最大理由。日本人不會那麼傻，而且在廈門的台灣人，很多專門為日本人搞情報的。回台後，有一次我們搬家，隔壁也搬來了一家父親少年時代的熟人。有一次，他那不識字的太太拿了一張單子來請教父親，竟然是高等課通知他們去領十五圓。父親才知道，人家來「陪」他，一個月可以領到十五圓。當時，豬肉一斤只要二角五分，一分錢可以買到兩條油條；家裡向人租一間房子四坪多大，客廳、廚房共用，一個月房租是四圓五角（日本人沒有角的單位，應該是四圓五十錢）。然而，父親以醫務助手的名義，在一位朋友的醫院裡，當眼科密醫，一個月的收入還不到二十圓。（以後出名了，一個月對分，可以領到三百多圓。）

我進中學那一年的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發生了。本來說可以撐兩年的山本五十六，為了四月十八日從黃蜂號起飛的十六架B25炸了東京，不得步尋找當年在珍珠灣逃掉的航空

註七 ◆ 二十世紀一〇年代，由在廈台灣籍民之核心團體——台灣公會所設立，以教導台灣及中國兩方面之子女為目的。台灣總督府除派遣教員之外，每年約補助一千元。在廈門市有三所；在鼓浪嶼共同租界區有一所；總共四校（皆為初等教育之學校）。

母艦。離珍珠灣不到半年的六月四日、五日，攻了中途島。雖然以阿留申為陽攻，但美國人已經解讀了日本的暗號，集中在中途島近海等著，趁日軍把炸彈換成魚雷，擊沉了「加賀」、「赤城」，以後又擊沉「飛龍」和「蒼龍」。實際上，大勢就如此決定了。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到二月七日，日軍雖趁夜暗逃出瓜島，年初二，在巴布哈的據點「布那」的日軍也被殲滅。所以，自二年級的第三學期起，差不多只唸了一半的書，我的英文的基礎就是如此被毀掉的。我唸了不少書，不管在戰前或戰後，甚至全校被召集去首淡水的那一段時間，日文、中文、德文都看，只是除了醫學的書籍以外，甚少主動去動英文書。

我算不了是生就的共產主義者。讀了《聯共黨史》以後，我甚至對清算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杜姆斯基、普列漢諾夫還有迫害克魯泡特金的布爾雪維克有點反感。而杜哈捷夫斯基的清算，更使我寒心。我在日據時代就唸過周佛海《三民主義解說》的「岩波新書」譯本，心裡卻傾向於寫《胡麻與百合》的拉斯金。儘管我對政治沒有興趣，命運卻使我與葉盛吉相識。仿如印度徒一樣，因為在談論中輸給葉盛吉，因此，當葉盛吉表明身份時，我為了表明對他的信任，被他收為徒弟而已。而葉盛吉本身可能同樣地被東大的先輩L（劉沼光，新竹新埔人，台大醫學院醫科第一屆畢業，地下黨學委之一，已逝。）說服的。在宣誓中，因為我直言批評中共在東北和華北的清算鬥爭，和自稱「老張」的監督人，爭論了一小時。不過，這一爭論卻沒有發生變化，很奇異地我不經過候補期，直接地成為正式的黨員。那是一九五〇年的一月二十三日，而以後我只和自稱「老朱」的人，見過兩次面，第三次，就是五月二十八日夜的那一幕。

五月十三日，在台大醫學院內被捕的，除

了第三內科主任許強和眼科主任胡鑫麟兩位老師之外，還有皮膚科的胡寶珍和耳科的蘇友鵬（外科的郭琇琮早已被捕）。五月十四日的《中央日報》，我看到以蔡孝乾為首的省委的（轉向）宣言。此後，我陸續聽到許多人在夜晚被捕，也聽到有關紅色吉普車的風聲。

葉盛吉曾在五月十六日到過台北，我只能對他說，等五月二十八日是否能見到「老朱」再向他通知。葉盛吉當時並沒有提到其他的事情，而且，當天他似乎還有差事要到瑞芳，也只能匆匆談了半小時。

二十九日的下午四點，我寄的限時信，還沒有到葉盛吉手中，他就在南部被捕了。我如斷了線的風箏，孤獨地飄浮。這三個星期，我在諦觀中靜待事情的發展。因為關於這件事，我沒有人可以商量。靜待，說得輕鬆，其實是很艱苦的日子，失眠、焦燥、偏頭痛，不過，也只好如此。前天，接到家裡的錢，我才稍得安心。妹妹的身邊有錢了，我清掉唯一的賒帳。不管以後的發展如何，雖然對家人及師長有無法交代的虧失的心情，但對一切私事都算交代清楚了。夜晚時二點以後到上午四點這一段時間，我盡量躲開。不過，今天K來了，我為了賺回那一段時間，只好趕著看書。

篠原的產科學是兩本，總論、各論各一本。不過兩位老師講的並不太多。以此為主加一些新的資料，所以我以三十二開的白報紙，寫下那些補充，把講過的地方，用筆做記號。回來就把那白報紙貼上，匆匆看了一遍，所以不到兩小時，就把它看完了。邱教授是只講大綱，吳副教授一切都是慢動作，重要的地方，一再地提醒。我自未滿五歲入泉州子江小學，可算是經過許多大、小考試，若不是目前心情低潮，那真是如〈失空斬〉的馬鬣的唸白：「那怕那小小的街亭。」 >> 待續



秋祭。李文吉 / 攝

■劉孝春

最近在和家父閒聊時，他突然提出一個令我頓時心情沉重的要求：當他死後，務必將他的骨灰灑在他所敬愛的老師及難友們犧牲的馬場町土丘上。我望著他因病而衰老的臉龐，嘴裡說著安慰他的話，心理卻想著：他的牢獄生活並不只有五年，而是一輩子啊！

從小到大，從家父口中聽過無數次「黃老師」、「姚老師」……等師長的名字，但是始終不清楚這些師長為什麼令家父念念不忘，直到看了他的〈回憶錄〉，終於有了較明確的輪廓。囿於篇幅，筆者先整理出家父〈回憶錄〉中所記載的恩師黃賢忠烈士的事蹟，以供有心瞭解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的讀者做參考。

據〈回憶錄〉記載，黃賢忠老師乃家

父就讀「義民中學」時的級任導師，在校時很少接觸，但在獄中，曾經因關在一起，日夜相處，意氣非常相投，有一天晚上，黃老師甚至提議和家父結拜為義兄弟，拿開水當作酒，認家父做弟弟。黃老師告訴家父他是廣東海豐人，還有一個哥哥在開米店，很富有，對一般家庭而言，他哥哥是很有用的人。黃老師本人則對革命很熱衷，會演話劇，對日抗戰時，曾在露天演過一場「盲人怨」，令在場的觀眾都感動的齊聲哭泣。來台灣以後，曾在「台北工專」當訓導主任，辭職以後本來打算去台中，不料來到中壢的「義民中學」意外遭到不幸，交待家父要通知已懷孕的黃師母，不久以後生產的嬰兒，可送到廣東海豐他哥哥那裡扶養。當時黃老師自己

把事情看的很透徹，對敵人沒有一點幻想，拿陳誠說的一句話：「對敵人仁慈就等於對同志殘忍」，抱著文天祥的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準備英勇就義。他並且教家父背誦文天祥的〈正氣歌〉。

黃老師被捕入獄第二年，即一九五二年，調查庭結案以後，軍法處的法官，把判決文送到國防部第二處批准，大約一百天就要執行死刑。黃老師這時被關在32房，未與家父同房。他在壯烈犧牲前幾天，趁著洗澡時間，冒險到24房，拿一小紙條給家父，交代說他已請台南工學院（現在的成功大學）學生王峯畫了一張肖像，在上面提了四首絕命詩。並且打了份報告給法官說：「滿清政府還有肚量把林覺民的絕筆書交給他的太太，你們國民黨政府認為比滿清政府還開化的話，就應該把這張肖像交給我的內人。」

六月十八日清晨是黃老師英勇就義的日子，六月十七日下午他提前被叫出，關太平間時，一出囚房他就高唱「義勇軍進行曲」，高聲喊「中國共產黨萬歲」，看守打他叫他不要喊，他就和看守對打。據當時關獄中的一位船員陸通楫轉述憲兵第四隊的話說，黃賢忠烈士就義前一直喊口號，劊子手開了五槍他才斷氣。而一般為省子彈，是規定只能開三槍的。

家父出獄後，詢問黃師母，才知那張題著黃賢忠烈士絕命詩的肖像畫，國民黨當局根本未交給黃師母。如今題詩人及作畫人都早已為革命而犧牲了。幸好五十幾年來，家父無時無刻不銘記在心。適值「秋祭」即將舉行之際，筆者在此便代替家父，讓那已存在他心中默念了五十三年恩師的絕命詩公諸於世，以供後人憑弔：

(一) 鯤島早已有蹄痕，
早將此身獻人群。
但願同志齊奮起，
刀斬斧截安足論。

(二) 滿腔熱血為三台，
（筆者按：台北、台中、台南）
從來未作死安排。
若得瘦骨埋斯土，
魂兮歸去亦快哉。

(三) 生死早已置腦邊，
漩入地獄亦泰然。
獨有一事情未盡，
寡妻孤女有誰憐。

(四) 黃昏入海搏蛟龍，
碧血橫飛馬場町。
千萬頭顱作一擲，
人民從此享太平。

在家父〈回憶錄〉中，除上述四首黃賢忠烈士親手交給家父的絕命詩外，另有一首詩，乃黃烈士犧牲後，黃烈士同房難友告知家父者。據說黃烈士英勇就義前幾天正好是「端午節」，黃老師因此有感而發吟了一首詩：

殘生有餘過端陽，滿杯不滿對屈原。
政治腐敗應改革，何必消極去投江。

黃烈士的第四首絕命詩，家父屢次向我是否有可能刻在「馬場町紀念公園」的石碑上？我無言以對……。在省籍矛盾，統獨爭議如此激烈，人民依然未能享太平的今日，又有多少人能理解五〇年代殉難烈士的心志理想呢？而那些親身經歷，親眼目睹五〇年代壯烈歷史的「老同學」們內心世界的痛苦與希冀，又有多少年輕學子願意去理解、撫慰，甚至承繼呢？但我仍要對黃賢忠烈士說：「安息吧！」因為歷史的長河終有清明之日，人類不會永遠屈服於黑暗墮落中……。

2003年9月19日 宇柔

寫於「秋祭」前夕◎

三農問題

會不會導致

中國崩潰？

李昌平生於1963年，中南財經大學經濟學碩士，曾在大陸農村擔任鄉鎮領導工作十七年（1983~2000），深感大陸的「三農」問題日益嚴峻，而於2000年3月上書總理朱鎔基，引起當局高度重視，兩度派員至農村實地調查。李昌平為農民請命的呼聲，促使大陸各界關注「三農」問題的嚴重性。2000年12月大陸暢銷報刊《南方週末》的讀者票選李昌平為年度人物。在大陸經濟高速增長而社會矛盾日形突出之際，「中國會不會崩潰？」近年來成為中國內外頻生爭論的熱門問題。李昌平這篇深刻分析大陸「會不會發生農民革命？」的文章，頗值參考。■□編者

■李昌平

從我2000年3月對總理說「心裡話」到2002年1月《我向總理說實話》與讀者見面以來，海內外引起了較大的影響，較冷門的「三農」問題變成了最熱門的話題。前不久我在香港待了兩月，很多朋友都問我同樣一個問題：中國的「三農」（農村、農業、農民）問題會不會引發農民革命運動，會不會天下大亂。海外很多人對這個問題高度感興趣，這可能是受了章家敦的書《中國即將崩潰》的影響。章家敦認為中國的「三農」問題很嚴峻，由此會爆發農民革命運動，從而引發一系列問題的總爆發——導致中國崩潰。對這樣一個十分嚴肅的問題，我似乎不能迴避。

中國的「三農」問題的確非常嚴峻

我曾用三句話來概括中國的三農問題，即「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其具體表現為：

1. 絕大多數地區的農民的農業收入在繳納稅費之後的剩餘，不足以維持農民勞動力再生產和農業簡單再生產。
2. 農村的原有基礎設施功能退化，教育、醫療和其他公共品安排名存實亡，農村市場蕭條，農村金融萎縮。
3. 農業增產不增收，農業投資持續下降，農村生態環境日趨惡化，不少農村已經開始退回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狀態。
4. 中央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資源十分有限，且有限的資源又不斷被基層政府組織吸納，解決「三農」問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體制和制度性障礙。面對嚴峻的「三農」問題，朱鎔基總理也坦言頭痛不已。

中國會不會爆發農民革命運動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問題長時間得不到解決，自然會讓人聯想到中國歷史上無數次改朝換代的農民革命運動。一些人大膽預測現代中國也會出現農村包圍城市的農民革命起義——導致中國崩潰。但我認為中國現在不會爆發農民革命運動。

第一，中國農村沒有導致農民革命運動的革命目標。

歷史上的農民革命運動是以「打土豪、分田地」為革命目標的，而這個目標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早就實現了。站在歷史的長河中看，毛澤東對中國的最偉大的貢獻就在於完成了農民革命。在中國農村經常出現局部性的農民反抗，但這種反抗只是以反貪減負為主要目標，

是局部的抗爭，當打倒了鄉村貪官，這種「有限革命」就結束了。在中國的學界和地方官員中，有些人在致力於推行土地私有化，以期解決中國嚴峻的「三農問題」。假如中國的土地制度真的回到了上世紀的30年代的私有制，中國也許就可能爆發農民革命運動。中國實有必要維持和完善現存的土地公有制度。

第二，中國農村沒有支撐農民革命運動的財政金融基礎。

1949年以前的中國，地主經濟是國家經濟的基礎，農民革命運動可以直接從「打土豪分田地」的過程中得到財政資源，並且迅速建立起解放區獨立的財政金融體制，以保障農民革命運動的可持續發展。即使當今中國農村爆發了農民革命運動，也是不可持續的，因為現在的中國，農業經濟的份額只占國民經濟總量的14%，且整個國民經濟形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農民革命者不可能在現代中國農村建立起支持農民革命運動的財政金融。

第三，中國農村沒有支撐農民革命運動的武裝資源。

1949年以前的中國，有地方軍閥武裝，地主武裝，土匪武裝，家族武裝，黨派武裝，民族武裝，甚至還有外國武裝的存在。到文化大革命後期，大隊民兵連長、甚至生產小隊的民兵排長也管幾條槍或幾十條槍。這些武裝資源的存在，是農民革命運動的武裝基礎。但現時中國農村連獵槍也沒有了，幾乎沒有了可以利用的武裝資源，沒有武裝的農民革命運動其破壞力量是極其有限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在中國依然是真理。

第四，中國農村稀缺支撐農民革命運動的組織資源。

1949年以前的中國，農村非政府組織資源是比較多的，有非執政黨派組織、軍事組織、宗族組織、宗教組織，民間經濟組織、民族經

濟組織，還有邪教組織、儒教組織、武術組織等。這些組織資源的存在，為農民革命運動的形成提供了可能。但當下的中國，幾乎所有的組織資源都在政府的體制之中。近年來非政府組織雖然有一些發展，但都在政府的嚴格管理之中，不可能成為農民革命運動的組織資源。

第五，中國農村稀缺領導農民革命運動的精英分子。

1949年以前的中國，鄉村社會是個精英治理的社會。每一個王朝的建立初期，鄉村精英的利益都是有保障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王朝日益腐敗，對鄉村社會的吸取無度，鄉村社會日益凋蔽，他們便領導比他們更加邊緣化的農民起來革命。鄉村精英階層在實現農民革命目標的過程中實現自己當官受祿的目標。實際上，農民革命運動中精英階層和農民階層的革命目標是不盡一致的，農民革命是農村精英與農民的聯合革命，農民是革命的主體力量，農村精英階層是革命的領導力量。而當今農村社會的大量精英進入了城市，剩下的精英基本上是體制內的既得利益階層，貧困農民是唯一的弱勢階層。現在的農村精英階層和農民的利益是對立的，不具備兩者聯合革命的可能。試想，一個缺乏精英領導的農民運動怎么可能形成呢？所以，農民說他們缺陳勝、吳廣。實際上是陳勝、吳廣拋棄了貧困農民，離開農村去尋找新的可供革命者分配的資源去了。

第六，中國的農民并不反黨反政府。

和上個世紀初不同的是，現在的中國農民依然相信黨和政府可以解決「三農」問題，絕大多數農民相信黨和中央政府是好的，只是少數干部和基層政府沒有落實黨和政府的好政策。特別是黨和中央政府一直強調「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強調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農民對黨和中央政府依然寄予

著高度的認同感。當電視上每天播放「三個代表在基層」的節目時，農民就能產生希望，中國的農民只要看到希望（而不絕望），他們不僅不是中國不穩定的力量，而是穩定的社會生態基礎。

現在的中國農民雖然很窮苦，但相對上個世紀初所不同的是能吃飽肚子。中國農民對溫飽以上的目標的追求，還需要時間。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有世界上最好的農民。

農民革命運動會轉換成另外的形式

中國的農民是中國的政治生態，當我們破壞生態時，生態會作出自我調整，最大限度的承受和化解「痛苦」，我們一時感受不到生態的報復。但生態的承受能力是有極限的，一旦環境條件發生變化是，脆弱的生態將爆發毀滅性的報復。如果因為農村不可能爆發農民革命運動就漠視「三農」問題的存在，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農民反抗可能轉換為城市問題。

中國農村有人口9億之多，每年還新增人口1100多萬。農村現有勞動能力的人有4、5億之多，每年還新增勞動力1000多萬，而農村只需要勞動力1億就足夠了，如果生活在農村的人的生活水平沒有實質性的提高，農村每年流向城市的人不只是我們保持8%的經濟增長所能夠承受的800萬人，而是3000萬、5000萬，甚至更多。農村勞動力的無限供給自然會導致勞工的待遇下降，勞資關係必然緊張，由於《勞動法》和工會組織沒有能夠保護農民工，那些在城市的無產階級農民工必將為享有城市居民待遇而抗爭——「三農」問題轉化為城市問題了。

上個世紀，共產國際及其中國的追隨者認為中國革命要以城市為中心，對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的農民革命運動不屑一顧，但他們錯

了。今天，中國農村問題十分嚴峻，有的人以為中國勢必要爆發農村農民革命運動，也許他們犯了一個同樣的錯誤——對中國的社會基本矛盾及其運動規律認識不清。

增加農民收入是中國穩定發展的根本

未來中國的三農問題與城市問題，農民反抗和工人運動會緊密的聯系在一起。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有序轉移是中國穩定的關鍵，而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村人的生活質量是一把打開中國通向穩定發展之門的金鑰匙。增加農民收入——農民購買力增強——城市經濟發展、就業機會增多——農民轉移加快（實現有序轉移）——增加農民收入，這樣的結果是城鄉良性互動、共同穩定發展。如果：農民收入減少——農民購買力下降、農民向城市湧入——城市經

濟社會惡化、城市就業崗位減少、城市工潮爆發——農民收入下降。這樣的結果是城鄉惡性互動、經濟疲軟、社會動蕩。

增加農民收入已經不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不能簡單的用一般性市場技術性方法來解決，還必須用社會系統工程的方法加以解決。解決這個問題的突破口是調整社會各階層的佔有社會政治經濟資源分配關係，首要的問題是減少對農民的歧視，擴大農民的權力。

朱總理說，他日夜思考的問題是如何增加農民收入，他說這個問題最大。這說明中國的領導人是清醒的。◎

{轉載自：農友 (<http://www.nongyou.org>)}

「從改革與發展的總體考慮，我國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問題的癥結就在於，改革以來並沒有始終堅持工農業協調發展，以農業改革發展為基礎的戰略。至少在1985年下半年以來，一度過於樂觀地估計了農業與農村經濟的形勢。我國改革與發展實際上實行的是一種過份向城市、向工業傾斜而忽視農業改革，忽視農業發展後勁的戰略。在一些地方的有關傳媒中，認為農業是「過關農業」，甚至以當農村書記為恥。90年代以來，中央把農業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一些地方又以「口號農業」、「會議農業」代替「過關農業」。這種重工輕農，基礎產業不「基礎」的問題，突出表現在理論上與實際上的不一致：一是表現為理論上的基礎產業即應是最熱的產業，而實際是最冷的產業；二是表現為理論上的瓶頸產業即是最重要最值得投入的產業，實際上是投入較少甚至是最少的產業；三是表現為理論上的弱質產業即應是重點保護、扶持產業，實際上是在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繼續擴大中處於受剝削地位的產業；四是表現為理論上的戰略產業或特殊產業即是應率先全面走向市場的商品農業，實際上當農產品短缺時，又成為至多是部分走向市場的「戰略產品」、「特殊商品」，是貢獻型農業。這是三農問題存在的思想根源。」

——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第233頁。

□ 涂照彥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 四八〇元

從日帝獨佔資本與以地主、佃農制為主軸的本地資本間之矛盾，解明殖民地台灣經濟形成的過程與本質……

□ 劉進慶

《台灣戰後經濟分析》 三五〇元

從「公業」、「私業」雙重構造，官商資本的支配，對美日經濟的附從化剖析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一九四五～一九六五）的性質與構造……

□ 段承璞

《台灣戰後經濟》 三五〇元

探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一九四五～一九八五）中官僚資本、集團企業資本，僑資、外資、中小企業資本，分析台灣外貿與產業構造的變貌……

□ 谷浦孝雄

《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 二五〇元

以六〇年代後高度成長的構造為焦點，解明做為美、日中心國家加工基地而發展的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之結構……

□ 陳玉璽

《台灣的依附型發展》 二四〇元

分析深層結構轉化及帝國主義體系功能變遷，以解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發展之機序，並批判地探討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的相應性……

□ 隅谷三喜男 / 涂照彥 / 劉進慶

《台灣之經濟》 三六〇元

刻劃台灣「獨裁下的成長」和民間經濟向海外擴展的勢頭。從農業、工業、勞動、金融財政、貿易和經濟體質，解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的實相。

□ Winekler等編

《台灣政治經濟學諸論辯析》 三八〇元

以西方當代保守派的、自由派的和激進派的社會發展理論，分析台灣資本主義的本質和結構，並交互進行各派分析之分析，檢視三派政治經濟學在台灣研究上的貢獻和極限。著名社會學者，除編者外，R. E. Barret、T. Gold、D. F. Simon之台灣資本主義論的總匯，向台灣在地社會學界提出無從迴避的詰問……

■ 杜繼平

《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 三八〇元

—— 統獨左右的上下求索

台灣戰後世代第一個接受完整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育的學者杜繼平，在科學對待當前大陸社會主義性質的基礎上，闡明當前台灣左翼應以克服民族在外力干涉下的分裂構造，追求祖國統一，並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揭發台獨運動的本質，批判郎中「左」派陳芳明知識上的荒疏，振臂呼喊「做一個理直氣壯的統一派」……

/ 本書要目 /

1. 從世界體系的觀點看台獨運動的過去與未來
2. 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
3. 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
—— 評陳芳明的所謂左翼台灣史觀
4. 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
5. 從《台灣論》風波剖視台灣分離主義的奴才意識

《新二二八史像》 編著◎曾健民 / 定價NT350

80篇歷史證書

首次大量出土新史料；事件當時大陸、香港報刊雜誌上的二二八評論、報導，以及詩、小說、創作

有初次公開的第一手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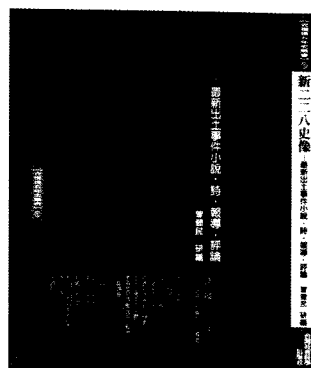
二二八女鬥士謝雪紅《告同胞書》

名記者范泉《記台灣的憤怒》

文匯報記者董明德《孤島一月記》

蘇新的《台灣的前途》

名作家郭沫若的《還要警惕著不流血的二二八！》



《天黑黑嘍落雨》◎詹朝立 / 定價NT350

—— 十二萬濃漁民大遊行傳真

「1123·與農共生」大遊行總指揮詹朝立親筆力作

文化評論家南方朔推薦：

「這本著作，所記述的不只是一次大遊行的因果經緯而已，更是當今台灣農漁民和農漁會艱苦情況的紀實報告，充滿了理解與悲憫的抗議情懷。」



《走進台灣》◎周良沛 / 定價NT300

—— 光和影的心靈紀實

作者周良沛是一位大陸資深的進步作家，且在台灣有豐富的生活經驗。本書超越了兩岸的歷史糾葛和現實迷障，以更廣闊的視野和深刻的感情，用獨特的紀實散文風格，描寫了台灣生活底層中許多不知名的或知名的人和事。藝術地概括了九〇年代前後台灣複雜的社會變動中的光和影，有鮮明的時代感。



直接訂購 優待

郵政劃撥 / 19747069

■電話 / (02)87714051

■傳真 / (02)87713801

■電郵 / tssra@sinamail.com

■地址 /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38巷2號2F